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九本，第三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七年九月

明代軍戶家族的戶與役： 以水澄劉氏為例

于志嘉*

明襲元制，以徭役定戶籍。軍役由世襲軍戶承擔，為確保軍役能持續不斷，明初規定軍戶不能分戶。嘉靖以後，隨著里甲黃冊制度漸趨變質，分戶反而成為地方官員藉以均平徭役的手段。特別在一條鞭法實施之後，明初以來以戶數原則編成里甲的要求不再具有意義；照田派役的結果，田多丁眾的軍戶可能被分割為數個徭役單位，登載在實徵冊中。面對此一趨勢，清軍御史也相應提出對策，隆慶六年的軍政條例就要求「見年均徭冊」的記錄需同時刊入軍、民黃冊。「戶」與「籍」成為兩個不同的概念，「分戶」不影響「同籍」。《水澄劉氏家譜》是東林黨人劉宗周的家譜，本文通過崇禎年間劉宗周修譜時留下的有關其家戶籍的記錄，除介紹劉氏軍籍來源、分擔軍役狀況，更將原籍軍戶的里甲賦役負擔放在賦役發展史的脈絡中加以分析，期能理解賦役改革浪潮下，政府為掌握特殊戶役戶的「戶」與「籍」，做過哪些妥協或堅持。

關鍵詞：軍籍 軍戶分戶 里甲制度 黃冊 一條鞭法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明代的軍戶」（編號 MOST-102-2410-H-001-026-MY3 (1/3)）之成果報告。

一・前言

明襲元制，以徭役定戶籍。軍役由世襲軍戶承擔，每戶需派遣人丁至衛所服役。為確保軍役能持續不斷，明初規定軍戶不能分戶，目的是要以全戶之力支援衛所軍役。正統以後又要求衛所軍人在衛落地生根，若干衛所軍戶戶丁又在衛所附近購置田產，附籍州縣，形成所謂的「附籍軍戶」。就戶籍管理的層面看，「原籍軍戶」、「衛所軍戶」與「附籍軍戶」共同構成一個軍籍，協力承擔一名軍役，彼此間有相互支援之責。然而，到了嘉靖初年，這種體制開始有了鬆動的跡象。宋昌斌，《中國古代戶籍制度史稿》有云：¹

對於軍、匠戶，嘉靖前一般不許分戶，以防減少役軍、匠丁額。後來由於“軍匠有人及數千丁、地及數千頃，輒假例不分戶為辭”，嘉靖九年制定軍、民、匠、灶一體分戶之法，規定：“不分軍民匠灶等籍，限田限丁，將州縣人戶事產通融總算，一體分戶”。但前提是要將州縣人戶通融總算一體分戶，“蓋欲同籍則承軍伍之役，分戶則應里甲之差。”即不能規避軍、民之差役。

此說應源自桂萼的建議（詳下文）。但一如筆者在〈論明代的附籍軍戶與軍戶分戶〉（以下稱舊稿）中所指出，「軍匠開戶」的理想其實並未能於嘉靖九年實現。《明世宗實錄》卷一一八，嘉靖九年十月戊寅云：

戶部議大學士桂萼所奏任民考，曰清圖、曰清籍、曰攢造、曰軍匠開戶、曰新增田地、曰寺觀田土、曰編審徭役，請上裁。得旨：新增田地、寺觀田土、編審徭役如議。餘已之，以免紛擾。

顯示該議儘管得到戶部的認同，終究未獲准行。不過，也正如舊稿所指出，早在嘉靖元年，桂萼任成安知縣時，就曾針對縣內丁多田廣的軍戶進行過分戶，其法「不拘舊定屯社之圖，不拘軍五〔伍〕不分戶之例，一以均里長之丁產、甲首之多寡為事」；「於黃冊之外別作一圖，名曰人戶歸圖冊，與黃冊判而為二；其今之黃冊則名曰地土歸戶冊，以相參對」。也就是在黃冊之外，另立「人戶歸圖冊」以行均平徭役之實。黃冊的功能則被限縮為「地土歸戶冊」，且所記地畝乃是「廣畝」，與實際徵派用的「小畝」又不相同。「人戶歸圖冊」的出現，給予有心改革的地方官無限的可能；而桂萼在成安的改革，代表了「嘉靖初年，隨著

¹ 見宋昌斌，《中國古代戶籍制度史稿》（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頁197註1，引《中國歷代食貨典》（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9）16：91a，〈戶口部〉。

各地方對賦役改革之需求，地方官本諸各自之行政裁量權，開始試行軍戶分戶以「均平賦役」的大趨勢，值得吾人重視。²

桂萼提倡編審徭役，被視為一條鞭法的最初倡導者。³ 他所提出的軍匠開戶，實為推行一條鞭重要的一環。⁴ 但歷來有關明代後期賦役改革的論述，卻鮮少提及這一層面。舊稿檢拾族譜中有關軍戶分戶的事例，時間都在嘉靖以後，間接說明明代後期的賦役改革，與軍戶分戶間有其必然之關係。但以資料缺乏，所論有限。舊稿發表後，筆者持續關注此一議題，近日閱讀《水澄劉氏家譜》，其中有劉宗周所記明末崇禎年間劉氏戶籍資料，引發筆者注意。因為此文，除介紹劉氏軍籍來源、分擔軍役狀況，更將原籍軍戶的里甲賦役負擔放在賦役發展史的脈絡中加以分析，期能理解賦役改革浪潮下，政府為掌握特殊戶役戶的「戶」與「籍」，做過哪些妥協或堅持。

² 參見于志嘉，〈論明代的附籍軍戶與軍戶分戶〉，《顧誠先生紀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頁94-96。

³ 參見湯綱、南炳文，《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上，頁415；王毓銓主編，劉重日、張顯清副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明代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上，頁302-303。關於一條鞭法的創始，岩見宏，《明代徭役制度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86），頁123, 133註52，以為最早可追溯到嘉靖十年，見《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123：17a，嘉靖十年三月己酉：「御史傅漢臣言：頃行一條編法，十甲丁糧總于一里，各里丁糧總于一州一縣，各州縣總于府，各府總于布政司，布政司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內量除優免之數，每糧一石，審銀若干，每丁審銀若干，斟酌繁簡，通融科派，造定冊籍，行令各府州縣永為遵守，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曾我部靜雄，〈一條鞭法の誕生地〉，《文化》17.6 (1953) 則認為，實錄所言只能說明該法實施於嘉靖十年，真正在嘉靖十年奏行一條鞭法的是提督南贛汀漳右副都御史陶諧。但一如高壽仙（《中國經濟通史·明代經濟卷》第三章撰稿人）所指出，嘉靖九年桂萼〈任民考〉中有關「編審徭役」的一項，到了嘉靖十年，被御史傅漢臣冠以「一條鞭」之稱，因此應把桂萼看成一條鞭法的最初倡導者。高壽仙同時表示：「說桂萼是一條鞭法的最初倡者，意思是，他以內閣大學士的重要職位，最先向皇帝建議在全國範圍內施行一條鞭法，至於一條鞭法的最初創立者，恐怕也不是桂萼。……它應是由地方自發并相互仿效而風行起來的制度。」筆者認同高壽仙的說法，同時也想指出桂萼在嘉靖元年就曾在地方推行過自己的理想。

⁴ 由於桂萼〈任民考〉是以他在成安施政經驗為背景，其中「軍匠開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筆者因此將「編審徭役」與「軍匠開戶」合起來看，認為「軍匠開戶」亦是推動一條鞭法的重要一環。

二・落入軍籍：衛所軍役的繼承與分擔

二〇〇六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清代民國名家譜選刊續編》，其中收錄〔浙江紹興〕《水澄劉氏家譜》，⁵ 為劉大觀纂修，清末抄本。根據該書題要，水澄劉氏族譜由劉文質始修於元至正二年（1342），經劉訓、劉棟、劉燕及劉炯等歷次增修，至崇禎六年（1633）劉宗周而義例大備，族譜始成。康熙二十年（1681），劉明孝仰承宗周遺意，訂成續譜。乾隆八年（1743），劉正誼三修族譜。三十四年，正誼次子大觀四修，《清代民國名家譜選刊續編》所收即此譜（以下簡稱《家譜》）。

題要又稱：國圖另存水澄劉氏譜三種，其一乃一卷本，劉宗周修，記事止於崇禎三年；其二為《山陰水澄劉氏世譜》，民國間節錄，抄本；其三為《水澄劉氏家譜》十二秩，係劉應桂等纂修之六修本，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以下簡稱六修譜）。二〇一三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家譜資料研究中心藏名家譜叢刊》，六修譜亦在其中。

劉氏戶籍據《家譜》，〈土田志・祖籍開後〉，乃是「山陰縣筆飛坊寄軍籍」。「寄軍籍」一稱頗為奇特，由劉宗周從小寄籍會稽，推測應是「寄籍」與「軍籍」的省稱。劉宗周在《萬曆辛丑會試錄》中著錄的是「會稽縣人」，⁶ 在諸多奏疏中也常以「臣原籍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自居。⁷ 查《劉宗周年譜》，宗周之父劉坡年十八而補會稽縣儒學生，隆慶戊辰娶道墟章穎之女，萬曆五年八月以痢疾卒，隔年正月二十六日章氏生宗周於山陰縣水澄里。維時家計淒落，室空如洗，章穎憐惜愛女，將宗周接至道墟教養。萬曆十七年，仲舅章為漢任壽昌儒學教諭，宗周隨章穎往壽昌就養。二十年母章氏與外家分爨，二十一年仲舅以擢官去任，宗周亦隨章穎離壽昌，二十二年乃隨母立家於道墟。道墟在會稽東鄉，

⁵ 案：水澄劉氏始祖劉文質於元代入居山陰水澄，而山陰與會稽於明、清時同城而治，為紹興府治所（參見附圖）。一九一二年廢紹興府，合山陰與會稽為紹興縣，《清代民國名家譜選刊續編》編者因而著錄為〔浙江紹興〕《水澄劉氏家譜》。《上海圖書館家譜數據庫》則著錄為〔浙江山陰〕，但又以劉應桂纂修者為五修本。

⁶ 參見馮琦等編，《萬曆辛丑會試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7b（總頁碼11618）。

⁷ 參見劉宗周，《劉子全書》（臺北：華文書局，1968）14：1a-2a，〈遵例陳情懇賜侍養以全子道疏〉；14：2a-3a，〈遵例再懇天恩終賜侍養以伸子情疏〉；15：1a-2b，〈恭承新命久病不能赴任懇乞聖恩俯容以原官致仕以全晚節疏〉。

宗周於萬曆二十五年由會稽縣弟子員補紹興府學生，同年中鄉試四十二名。對此，《年譜》有云：「維時水澄劉氏，向不識所謂宗周，一小孺子寄養外家，一旦成名，莫不驚異」；⁸ 益可見宗周與會稽章家淵源之深，與山陰本宗則疏於往來。進士題名碑錄宗周自述為「浙江紹興府會稽縣軍籍山陰縣人」，⁹ 殆以山陰縣軍籍寄籍於會稽之故。

筆飛坊據嘉靖《山陰縣志》卷一，〈疆域志·坊里〉，為城西北隅第五圖。¹⁰ 嘉慶《山陰縣志》卷六，〈土地志·坊鄉市鎮驛鋪〉調：¹¹

西北隅在嘉定中為第四廂，領坊二十，曰賢良、曰火珠、曰少微、曰板橋、曰北市、曰瓦市、曰雙橋、曰水澄、曰新河、曰大路、曰石灰、曰錦鱗、曰武勳、曰畫錦、曰迎恩、曰草貌、曰筆飛、曰斜橋、曰戒珠、曰王狀元。元始改為西北隅，領坊三十，以斜橋入東北隅，增船場、丁家、禮賓、承恩、萬安、光相、中正、昌安、大雲、五福、紫金十一坊，總前為三十坊。以上（西南、西北）二隅舊坊，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始并省如今制。

明代山陰、會稽兩縣與紹興府同治，城內四隅，西二隅隸山陰，東二隅隸會稽。西北隅之稱始於元代，乃是在宋代第四廂的基礎上，除去斜橋一坊，增入船場等十一坊，總為三十坊。洪武二十四年省併為十四坊，劉氏所居之水澄大約就在此時被併入了筆飛坊。

劉氏定居水澄自劉文質始。《家譜·續譜記事》有云：

吾族世系遡漢以來，源流較他族最遠，支分自閩而廬陵而維揚，盛于宋，替于元，其著族水澄者，自邑幕公之官山陰始。

邑幕公即劉文質。〈年表初編〉謂文質於大德中以才幹任山陰縣幕官，因家山陰。〈列傳·幕公世家第一〉記水澄形勝曰：

邑幕公卜居水澄，蓋郡城中風氣最勝處。形家者言：城南二水，從南堰、水扁兩廓門入，北流數里，至此交會，其水澄泓不流，故名。而劉遂托以日大，迄今三百五十年，水澄一帶，門第相望，近百餘家，無一他姓錯趾其間者。又分之為新河、西小路，以往不可勝紀。

⁸ 以上見姚名達，《劉宗周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 13-27。又見《劉子全書·年譜》40 上：1b-7b；《家譜·列傳·兩世先贈公附狀》第 3 冊，頁 163-164。

⁹ 李周望輯，蔣元益、王際華等續輯，《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頁 1092。

¹⁰ 許東望修，張天復、柳文纂，嘉靖《山陰縣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1：12a。

¹¹ 徐元梅等修，朱文翰等輯，嘉慶《山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6：1b-2a。

南堰又作「南堰」，為植利門之俗稱，位置在城正南近東；由正南曲而西折為西偏門，又稱水偏門；再往西行，位在城南西隅的是常禧門，俗稱岸偏門，與水偏門相隔僅一里。¹² 水澄巷在蛾眉山之東，¹³ 這一帶到劉宗周時已聚居百餘戶人家，俱為文質後裔。由水澄分出去的還有新河分宗、西小路分宗等，明末可稱盛極一時。

文質有二子，長瑞卿、次瑞吉。瑞卿有三子，子才、子華、子全；瑞吉有二子，子方、子名。子方於洪武中坐市民充吏法入戍邊，得貴州之烏撒衛，劉氏軍籍自此始。

子方號芳齋，因明初止許鄉井之力田者充吏而禁市民，因而得罪。充戍時，長子謙「甫踰冠」，即率弟謹往來貴州供父衣履。¹⁴ 謙有三子，長子坦進承大宗，¹⁵ 仲子壘奉父命隨叔謹往貴州，不幸死於途；子方則因謙代役得歸老於山陰。劉謙代役後死於戍所，一說以督運死京師，少子圻奔喪，僅挈其衣履歸葬雄山。所司行原籍督取嗣丁，本應由謙長子坦之長子鏹充行，圻長子鑄慨然欲往，於是鬻家資，偕鏹及謹孫鐸同往，購募一同姓人代籍聽點，並為之置田贍給，此後軍役遂由該同姓人應承，山陰子孫從此免除了親身赴役之苦。

¹² 參見嘉慶《山陰縣志·土地志·城廡橋道關津》5：2b。

¹³ 據嘉慶《山陰縣志·土地志·城廡橋道關津》5：5a-b，「由蕙蘭橋轉而北為舊布政分司，由大雲橋西為塔山，前為山陰學；由府橋折而南舊鹽運分司，為酒務橋；由鎮東閣折而北為佑聖觀，東為火珠山、火珠巷、舊按察分司，蛾眉山北為倉橋，東為水澄巷，西為如坻倉，又西為鐵甲營，又西為鯉魚橋，又西為養濟院。旋南過錦麟橋為線長營、臥龍山後一帶，再南即總捕廳衙門及舊稅課司。由鯉魚橋北下為武勳坊西小路，東則新河巷，再北則為北大路、北小路而至迎恩門。過東則筆飛坊探花橋，再北則戒珠山下馬橋，至昌安門」。鎮東閣、火珠山、蛾眉山的位置參見附圖，即同書5：7b-8a，〈土地志·今城分治圖〉，約在城中心偏東北處；昌安門則在城北東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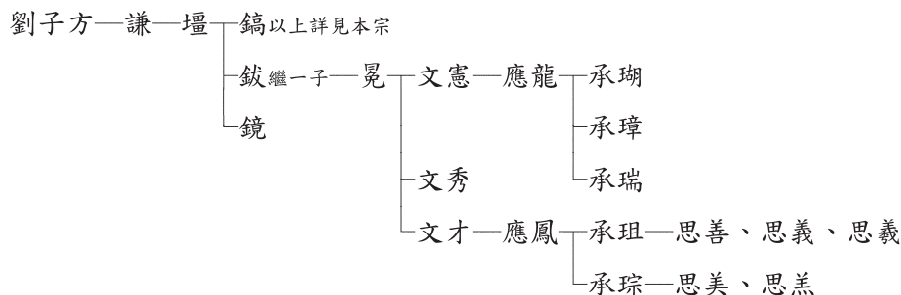
¹⁴ 據〈年表〉，謙生於元至正十二年（1352）庚子（1360），永樂壬辰（1412）卒；謹生於洪武二年（1369），宣德癸丑（1433）卒。〈謙齋遂安列傳第三〉謂謙生於元至元庚子，卒於永樂壬辰，享年五十三；謹則「少謙齋九歲」。案：至元無庚子，至正十二年非庚子，應為至正二十年（1360）之誤。烏撒衛置於洪武十五年（詳下），子方坐戍時謙「甫踰冠」，或子方坐戍即在洪武十五年。其時謙二十三歲、謹十四歲，即相隨同往。參見《家譜》第1冊，頁416-417；第3冊，頁17-21。但府、縣志又謂劉子方赴衛時謹才六歲，若如此，其赴衛時間更應前推至洪武七年，時劉謙僅十五歲，未及冠，烏撒衛亦尚未設立，時間諸多不符。方志所記有誤，理由詳下。

¹⁵ 參見《家譜》第1冊，頁81，〈世表〉。

上述經過詳見六修譜，〈贈言續編·謙齋公傳〉。¹⁶ 撰文者林日宣，受劉明孝之託而寫此傳。劉宗周執筆的〈列傳·謙齋遂安列傳第三〉不記此事，僅在劉謹傳中提到謹為謀父歸，曾「悉鬻其家貲以往，更謀所以代兄者。其事秘不傳，凡三返貴州，遂得歸芳齋公」。《家譜·列傳·檜菴怡軒列傳第七》則云：

始居賢公（圻）年二十餘而自越入黔，萬里奔父喪，人稱謙齋（謙）有子。既而于役戎籍者復死絕，所司行原籍勾取嗣丁，則謚菴（鏐，一名鏐）當行。而居賢之長子曰檜菴（鏐）者慨然曰：昔吾先人父子兄弟爭死王事，今忍獨累吾兄乎？於是檜菴與謚菴同上貴州，而素菴（玘）之子怡軒（鐸）亦偕行，卒定其事而返。自此吾宗無上貴州者。

既謂「其事秘不傳」，後人便也很難從這些有限的文字敘述看出後來何以能「卒定其事而返」？只有配合林日宣的記事，才能清楚了解劉謹盡鬻家貲，為的是要尋求能代替兄長劉謙繼承軍役之人；而劉鏐、劉鏐與劉鐸同赴貴州，之所以能「自此吾宗無上貴州者」，正是因為在貴州找定了人選，買好了膳軍田，¹⁷ 一切都已安排妥當的緣故。但因事屬隱晦，對外只能三緘其口，並且為了障人耳目，更將劉冕認作劉鏐繼子，以示其繼承軍役之正當性。將《家譜·分宗世表·貴籍分宗》整理後，可以知道繼子劉冕此後確也不負所託，子孫代代繼承軍役，至崇禎六年劉宗周撰譜時始終不缺：



對於這一支，劉宗周，〈家譜義例〉如是說：

¹⁶ 參見六修譜，第3冊，頁363-367。

¹⁷ 繼役的劉冕應募自貴州。六修譜，第3冊，頁369，來集之，〈贈言續編·謙齋公傳〉即言：「（鏐）於是謀鬻家貲，偕鏐及謹孫鐸往，購募一同姓人代籍應役，置膳產給焉。遂得永免。」

按：華三府君于洪武中坐法戍邊，得貴州之烏撒衛，今子孫有世居貴州者，已聽其自為宗矣，而猶綴名于譜後，不忘其所自也。然法在所畧矣，其事既莫得而詳，其隱尤弗忍詳也。君恩與祖德，君子于此有無窮之思焉。附貴州軍宗如舊例。

是雖以「子孫」稱之，但畢竟無血緣關係，因而令其「自為宗」。至於其來源始末，則不得其詳，更不忍詳其隱，只能留給後人無盡的想像。

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家譜》敘事之委婉，方志對子方赴役以至歸老間的歷程卻有全然不同的說法。萬曆《紹興府志》卷四五，〈人物志·孝義〉云：¹⁸

劉謹字惟勤，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¹⁹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輒知痛其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吾越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廼矍然曰：雲南雖號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為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楚，衆勸勿行，卒不能尼。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即欲以身代戍，冀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攜其伯兄子往，而伯兄子亦尚孱弱，未能自立，於是又復歸，悉鬻其家貲以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其父也。父歸，家徒四壁，幾不能為生，謹力供菽水，晨昏必極其歡。督學使者張倬為傳其事，一時縉紳先生司馬恂、朱文淵輩並詩歌之。其後子孫科第相繼，人以為孝子之報。

郡志記劉謹孝行，除將劉謙卒年大幅前推到劉謹六歲時，並將所有救父行為歸作劉謹一人所為。從十四歲即隻身走雲貴，欲以身代父；後來受國法須以十六以上嫡長男更替所限，不得不回山陰攜謙子以往；繼而因謙子孱弱不能自立，再返山陰鬻家貲而去，前後三往返始求得父歸。從「督學使者張倬為傳其事」，「縉紳先生司馬恂、朱文淵輩並詩歌之」，可以了解劉子方歸老山陰，在當時地方上堪稱大事。然而，購募外人應役，事非律法所能容，²⁰劉家因此隱去事實真相，讓劉謹一人承擔孝子的美名。

¹⁸ 見蕭良幹等修，張元忭等纂，萬曆《紹興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45：12b-13a。

¹⁹ 案：烏撒衛置於洪武十五年，初隸雲南都司，明年隨府改隸四川布政司，永樂十二年改隸貴州都司。參見黃宅中修，鄒漢勳纂，道光《大定府志》（成都：巴蜀書社，2006）43：3a，〈武備略·經政志〉。

²⁰ 相關軍政條例規範，參見于志嘉，〈明代軍戶中的家人、義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3（2012）：508-509。當時劉家不乏精壯戶丁，卻另買義男頂補，按例必須「正軍全家調發別衛充軍，頂替之人就收本衛補伍」。

萬曆府志的記載，其後大體為《明史》所沿襲，²¹ 但略去劉謙「以督運死京師」事，使劉謹之孝行更加凸顯。直到康熙年間劉明孝續修家譜，²² 其時烏撒軍役已不能再為劉氏家族造成威脅，²³ 這才開始為劉謙父子平反。康熙《山陰縣志》卷三二，〈人物志·孝友傳〉亦從而更正其事蹟如次：

劉謙，字惟恭。弟謹，字惟勤。洪武中，父謫戍于貴州之烏撒衛。謹年六歲，問貴州何處？家人遙指西南，輒望西南天，朝夕哭拜。時謙方弱冠，將往貴州寧親，謹年十四，泣曰：余獨非人子乎？遂與兄偕行。是時南荒初靖，道路荊棘，行六月，始抵貴州，所至艱辛萬狀。遇父于逆旅，父子兄弟間相持慟哭，行道悲傷。居久之，父患瘋痺，謙欲以身代，因留奉父。謹歸越，携其兄之子壻以往，而壻又卒於途。既而復歸，悉鬻其家資以往。謙代父役，遂死于戍所。謹凡三返貴州，得歸其父，時家徒四壁矣。色養愉愉，計所以寧親者百方，迄於壽終。有謙以殉父，有謹以全父，各成其孝，允稱兩難。

這一段由劉氏家族提供的新傳，除了為劉謙、劉壻父子的犧牲奉獻做出平反，另一方面卻又將劉謹鬻家資以往的目的，說得像是為了協助劉謙在衛安家之用。至於購募同姓人代籍聽點的事實真相，終究屬於家族秘密，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方志中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劉壻的記載。萬曆府志謂劉謙早死，而劉謹所以鬻家資以往，源於謙子孱弱不能自立，這種寫法很容易被解讀為劉謹攜家資赴貴州，為的是扶植孱弱的謙子，從而造成劉謙嫡裔在貴州繼役的錯覺。與之相呼應的，是劉棟於嘉靖年間撰寫的〈告始祖墓文〉：

華三府君，法律受謫，膽壯氣豪，挺挺孤身，滇南萬里。受代及歸，十有八載。冢嗣客死，慙遺二丁。馴至永樂，七十二終。²⁴

²¹ 見張廷玉等奉敕撰，楊家駱主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296：7592，〈列傳·孝義一〉。

²² 六修譜，〈贈言續編·謙齋公傳〉有兩篇，一為林日宣撰，一為來集之撰。兩篇皆受劉明孝之託，撰寫時間前者標明為辛亥，是為康熙十年。參見六修譜，第3冊，頁364。

²³ 據道光《大定府志·武備略·經政志》43：6b-7a，烏撒衛於順治十六年納入清朝版圖，同年罷衛所世職，設守備一人、千總一人，而經歷、教授、訓導如故。康熙三年罷衛訓導，五年罷衛經歷，二十六年罷衛守備、千總、教授，明之衛制悉革。取而代之的是一鎮二協三營之制，明代軍籍不再具有任何意義。

²⁴ 參見《家譜·土田志》第3冊，頁452-456。

由此看來，當時塑造的假象確實是劉謙客死異鄉，遺下二丁在貴州繼役。康熙縣志則以劉宗周家傳為本，²⁵ 謂劉壇死於赴衛途中，繼子方軍役的是劉謙，劉謹鬻家貲當是為籌措劉謙在衛安家之費。到了嘉慶《山陰縣志》，劉壇有了單獨的傳記。卷一四，〈人民志·鄉賢〉：

劉壇，以父謙遠戍貴州，甫新婚，妻有娠，即垂泣曰：父代祖戍，吾不能代父戍乎？若孕生子，宜名鎬。竟往不顧。至黔，屢遣歸，輒慟哭。會謙以運糧溺死，壇弟圻字居賢痛父死戍，求骸萬里之外，數年未得，朝夕慟哭，行道為之悲傷。已而所司行原籍勾丁，壇長子鏐，²⁶ 謙之冢孫也，當行，圻子鑣挺身願往，曰：吾父求祖骸未得，吾將偏求以成父志。力辭鏐，鏐不可，曰：吾得見祖若叔死戍遺跡足矣。遂偕行，所至哀思題詠。

演變至此，劉壇不但不曾客死於途，且幾番往返貴州，求代父役而不得。對此，縣志作者亦由不得不起疑，在傳後附上案語：

案：萬曆府志載：謙弟謹，攜其兄子壇以往而卒於途。此云至黔，則已至戍所矣。謙溺死而不復及壇，又似壇先父死者。或壇歸而卒於途歟？前後情事微有矛盾。

這當中的矛盾，源自於劉氏家族不能說的秘密；對此，劉宗周亦感嘆曰：

公（謙）兄弟兩人戮力周旋於萬里間關之際，而公獨父子殉死，越二百餘年人無傳者，竟讓其弟遂安（謹）成名，豈其後人有顯晦之殊耶？²⁷

顯然，劉氏後人面對謙、謹二祖的態度是有「顯晦之殊」的，起初可能是礙於現實，不敢昭顯；後來可能秉於私心，將錯就錯。而知道事實真相、為劉謙抱屈的，應不僅止於劉宗周。儘管如此，他在修譜時仍維持隱晦的態度，不敢將真相公諸於世，就是因為當時軍役仍在，不想惹事生非的緣故。²⁸

²⁵ 參見《家譜·謙齋遂安列傳第三》第3冊，頁17-18。

²⁶ 案：鏐實為壇長子，參見《家譜·年表》第1冊，頁418, 420。

²⁷ 參見《家譜·列傳·謙齋遂安列傳第三》第1冊，頁17-22。劉宗周對此耿耿於懷，於傳末復言：「其後遂安累葉顯榮，人以為孝子之報，而謙齋獨否，將無積厚者流光，抑之愈久而愈不可量乎？按：郡志載遂安初上貴州在伯兄身歿之後，訛甚。今改正如前。」

²⁸ 明代軍戶為規避軍役造成家族歷史扭曲的事例不勝枚舉，以單一家族為個案的分析又見于志嘉，〈異姓別籍或復姓歸宗：以廬江錢氏家族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5.4 (2014)。

子方在貴州另有子名保，²⁹ 本隸軍籍，以功陞總旗。其子剛遷閩中，遂為閩中人，又以功陞試百戶。剛生一子曰元，降總旗。元生二子，曰恒、曰釗，恒襲總旗，後未詳；釗一子曰琪，琪一子曰士彥，士彥一子曰國英。國英於天啟元年(1621) 由鄉進士任京縣知縣，時宗周官京師儀曹，兩人曾有往來。國英自言始祖華三府君諱子方，相傳來自紹興之水澄巷，然何以至蜀卻無考。國英後以考察去官，兩支遂又失去聯繫。

子方赴戍時，少子訓尚在襁褓，比稍長，聽二兄出入黔中，訓則一意居守董家政。其時子華之次子諤以科舉案罹禍，³⁰ 家難相仍，劉氏幾不能立門戶。劉訓振其中衰，首立公田若干畝為軍宗湯沐費，又酌為迎送往來之禮；他將兄弟分作三宗，歲三週，每宗一人遞掌之，積田之所入以儲用。³¹ 他所立下的規範其後為子孫所遵循，《家譜·典禮志·軍宗卹典》有云：

華三府君占籍貴州，其後人荷戈執戟以禦魍魎者，百世如一日。余輩獨非子孫乎？而坐享寧謐。一旦設身以處，吾知食之不得下咽矣。祖宗故遺有軍裝田以供湯沐，軍宗按時回籍，業有常規。遵行二百年，而邇者不無稍稍凌夷，迎送之禮，日趨于涼；所遺軍田亦以典守之不一，遂化而為烏有者過半。識者恫之。一日邀祖宗之靈，恢復舊田如額，又加置伴送田二畝零，免臨時科派之累。而所推恩于往來之際者，視前日有加鄭重焉。仍酌定新規以示永久。故事三宗鼎足，一切湯沐之供竝無軒輊。近者日涉房暫處單弱，供事獨殷，族議量紓其力之半，而以素菴代，亦一體疴癢之誼也。

〈軍宗卹典〉由劉宗周撰寫於崇禎六年(1633)，由之可知經歷二百年時間，軍裝田頗有失額，恤典亦趨簡慢。經宗人重新再議，於恢復舊額之外更加置伴送田二畝零，合正租、伴送共田二十畝零，每年現租銀合計十五兩三錢七分，俱由掌事房收貯。軍宗回籍，據合同每十年一次，「回日查其本地方印信路引，并往日本宗合同文書，以防詐偽」，當日並由掌事房備妥迎風席四果八饌加湯餅，為之接

²⁹ 參見《家譜》第1冊，頁408-410。〈分宗世表·貴籍分宗〉後附有案語：「子方之後有遷四川重慶者，曰保，子方子也。」但此子究從何而來，譜中並無交代。或為子方在衛另娶妻所生子，又或為養子，不得而知。

³⁰ 事見《家譜》第3冊，頁10-15，〈列傳·昭父謫臣列傳第二〉；王世貞撰，董復表輯，《弇州史料前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9：8b-9b，〈科舉考上〉。劉諤原中洪武三十年會試，廷試一甲第三名，後因是科得舉者皆江南士人，北人落籍者許考官私其同鄉，太祖怒刑考官，劉諤亦受牽連遇難。

³¹ 參見《家譜》第3冊，頁22-25，〈列傳·日涉列傳第四附仁壽公〉。

風。次日起改由各房子孫依序輪流為之備膳。縉紳及素封之家照迎風例，人家消乏者只需備四饌四蔬。若願折乾，家境豐者每日贈膳銀一錢，薄者八分。長官攜家眷回者，概行折膳。膳期以百日為限，過期不贈。軍宗將行，由「掌事房通算軍田十年所積租銀，并新置伴送一項，如數交贈」，仍備席以饒如迎風。若距前次回籍不及十年，則只付此來之前各年分租銀。同時由「掌事房啟家長，會通族公立合同文書，備開租銀交付明白及往年年月，一樣二紙。一付長官，一存本宗，付掌事房收貯惟謹」。這是水澄劉氏作為原籍本宗對貴州軍宗提供的軍裝資費。

三・家業擴增：原籍徭役與優免

劉訓中興家業頗為有成，〈列傳〉謂其於「坊頭里役，十年供應，咸有良擘」，是在經歷劉謹盡鬻家貲，一度面臨家徒四壁的窘境後，已然恢復到足以應付坊頭里役的程度。到了他的下一輩，劉謹的長子劉玘當家，「更謹身節用以先之，用稍擴前人之業。已而大饒」，甚至出任「里中萬石長」。圻長子鑛也曾「以稅長從役轉餉」；玘次子鉞從事貿遷，亦「屢董部稅」。³² 但劉氏財富的大量積累，當與劉棟（謹—玘—鐸—澤—棟）³³ 的入仕有關。

劉棟，字元隆，初號水澄，後改號艮所。正德六年（1511）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正七品）。嘉靖初，以編修議大禮，被廷杖下詔獄幾死。尋赦，復原職，嘉靖四年六月陞左春坊左中允（正六品），同年丁父憂，服闋，得湖廣右參政（從三品），十一年三月陞河南右布政使（從二品），尋改左，十二年十一月陞南京太僕寺卿（從三品），十三年十一月陞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正三品），十七年五月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正三品），³⁴ 丁繼母憂，二十三年十月起復原職，二十七年（1548）二月致仕，同年以疾卒。³⁵《家譜》謂其「性簡淡，通

³² 以上參見《家譜·列傳》第3冊，頁22-24, 26, 33, 35，〈日涉列傳第四附仁壽公〉、〈素菴列傳第五〉、〈檜菴怡軒列傳第七〉、〈養拙質軒列傳第八〉。

³³ 劉棟世系參見《家譜·世表》第1冊，頁81-82, 92-94。

³⁴ 官吏品級參見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萬曆《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10：2a-8b，〈吏部·稽勳清吏司·資格〉。

³⁵ 參見《明武宗實錄》73：11a-b，正德六年三月丁丑。《明世宗實錄》52：7a，嘉靖四年六月辛亥；136：8a，嘉靖十一年三月戊寅；156：4b，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庚申；169：1a，嘉靖十三年十一月甲子；212：2a，嘉靖十七年五月乙亥；291：8a，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庚寅；333：3a，嘉靖二十七年二月辛酉。《家譜》第1冊，頁425, 431，〈年表〉；第3冊，

籍四十年，承其先世遺產，未嘗有加殖，僅築芙蓉書院一楹為讀書之所。清風介節，表絕一時，人以趙清獻擬之」。看起來是位始終以廉靖自持的人物，有生之年也不曾添置過任何田產。但他有一位精明能幹的弟弟劉柱，年紀輕輕即代父「理家政。自司馬以下，凡私房錢穀出入，皆聽公總其綱」。³⁶ 劉宗周在〈司馬公列傳第十一〉記下一則兄弟間的軼事：

後先家居，率閭門養重，不輕以事接當道。仲弟嘗坐私販事露，為有司所持，公不為動。會巡方使者舒君過郡訪公，公不見，隨以一詩箴走謝曰：獨坐幽居眼倍清，黃庭一卷養心經。西風吹動鵲鴿急，那得安然坐草亭。舒覽之曰：劉司馬兄弟有故乎？立命有司釋之。其丰采不羣類如此。

劉柱究竟做過甚麼走私貿易，家譜中不曾說明，但從山陰縣境內有錢清、三江二鹽場，³⁷ 推測與私鹽有關。劉柱因走私被監禁，劉棟表面不動聲色，卻趁巡按御史舒汀過訪，贈詩暗喻。果然舒汀看在劉棟面上，無罪開釋了劉柱。³⁸

不過，劉棟出任三品京官，為家族帶來的最大利益還不在此。崇禎十年，劉宗周作《家譜·土田志》，就很明確指出：

相傳正嘉間，先司馬公以詞林游歷三品部堂，歲叨優免，恩澤及于全戶。至公沒後，又叨遺澤三年。祖宗待臣僚如此其厚也。亦以世方全盛，見一時輕徭薄賦之風，故劉氏積累至富，合族戶田盈萬三千畝。³⁹

頁 59-67，〈列傳·司馬公列傳第十一〉。〈列傳·司馬公列傳第十一〉所記時間多有不符，如謂「在汴三年」、「南太僕三年而轉太常」、「致仕歸，明年以疾卒」等等，茲據《實錄》及《家譜·年表》改。

³⁶ 參見《家譜·列傳·南塘南園龍吟二峯列傳第十》第 3 冊，頁 49-52。劉柱生於成化二十一年 (1485)，嘉靖乙卯 (1555) 卒。其父劉澤生於景泰元年 (1450)，嘉靖乙酉 (1525) 卒。劉澤死時，劉柱四十一歲，他開始代父理家政自然是更年輕時的事。

³⁷ 參見嘉靖《山陰縣志》1：9b，〈建置志·公署〉。

³⁸ 「西風吹動鵲鴿急」，語出《詩經》（葛培嶺注譯，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頁 255，〈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舒汀，侯官人，嘉靖十四年進士。何喬遠，崇禎《閩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75：58a-b，〈人文志·名賢〉，謂其「以行人選御史，奉使按兩淮及南直隸江南四郡，繼按浙江。為人簡伉，重氣節。先按江南，鋤擊奸豪，風裁赫著。及按浙，嚴峻稍減，而秉法懲惡，肅吏庇民，矻矻如舊」，「人稱名御史」。他曾於嘉靖十八年任巡鹽察院，嘉靖二十二年任浙江巡按監察御史，對私鹽應是取締唯恐不力，但終究免不了官官相護，為了劉棟的一首詩，釋放了劉柱。參見馮惟敏纂修，王國楨續修，王政熙續纂，萬曆《保定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7：15a，〈職官表〉；陳善等修，萬曆《杭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10：13b，〈會治職官表〉。

³⁹ 參見《家譜》第 3 冊，頁 481-482。

《劉子全書》卷二五，〈劉氏義田權輿說〉亦言：

不肖宗周聞之長老：往者祖宗盛時，先司馬公嘉惠宗祊，舉族托其宇庇垂三十年，致劉氏戶田盈萬三千畝而富甲郡城。⁴⁰

明代京官優免之濫，自明初即然。《明經世文編》卷四一六，呂坤，《呂新吾先生文集》，〈摘陳邊計民艱疏〉云：⁴¹

夫免役之法，所以優士大夫也。國初京官有全戶優免者，後以民力不堪，累朝更定。

可知京官全戶優免，其來有自。後因優免太多，造成小民徭役負擔過重，累朝更定。根據酒井忠夫、和田正廣、張顯清的整理，嘉靖以前相關優免則例至少有過以下的變化：⁴²

1. 洪武十年，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實錄》（酒井、和田）
2. 洪武十二年，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實錄》（酒井、和田）
3. 洪武十三年，令六部、都察院、應天府并兩縣判祿司、儀禮司、行人司、隨朝官員，除本戶合納稅糧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盡免。⁴³~~《萬曆會典》（酒井、和田、張）

⁴⁰ 《劉子全書》25：5b，〈劉氏義田權輿說〉。以上所引見「錄本」，與「底本」文字略有差。「錄本」、「底本」之來源，參見是書卷首，董瑒，〈劉子全書抄述〉。

⁴¹ 參見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416：1a-b。據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5-1966），頁259，呂坤，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歷官山西巡撫，擢刑部侍郎。立朝持正，以是為小人所不悅，欲中以奇禍，遂致仕，年八十三卒。

⁴² 參見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60），頁199-207；和田正廣，〈徭役優免條例の展開と明末舉人の法的地位—免役基準額の検討を通じて—〉，《東洋學報》60.1/2（1978）；張顯清，〈論明代官紳優免冒濫之弊〉，《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4。

⁴³ 以上所舉史料1、2，參見《明太祖實錄》111：6a，洪武十年二月丁卯；126：2a，洪武十二年八月辛巳。濱島敦俊著，吳大昕譯，〈明代中後期江南士大夫的鄉居和城居——從「民望」到「鄉紳」〉，《明代研究》11（2008）：69，將史料1發佈時間誤植為「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丁卯」，認為在這個時期，「首先受到優免的，只有現職的官員，並不及於致仕的官員。就此看來，似乎是指徭役全免，也就是連正役也優免。但是如此寬大的規定……在十三年之後失去了法的規範力」；「洪武十三年，也就是『胡惟庸之獄』這樣肅清官員的政治風暴發生的時間，會出現這樣對於士大夫官僚冷酷的規定，應該是很可能的」。其說又見氏著，〈農村社會——研究筆記〉，《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145，文中明確區分史料1、2、3，也特別指出「洪武十年的上諭最為寬大」。濱島氏以洪武十三年為界，認為此前對於士大夫家族擔任徭役問題，最為寬免；〈洪武十三年令〉受胡惟庸之獄影響，變得極其嚴苛。其說值得重視。

4. 正統元年令，在京文武官員之家，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俱免。（外官半之。）⁴⁴ ～《正德會典》（和田）、《皇明太學志》（張）、《武進縣志》（酒井）
5. 正統十年令，監生家免差役二丁。～《萬曆會典》（酒井、和田）
6. 弘治十七年，除隨朝文職、內官、內使，丁差俱照舊例優免。其餘現任方面官員之家，各免人丁十丁。知府免八丁，同知以下至知縣等官，各免人丁三丁。八品以下至雜職、省祭、聽選等官，及監生、舉人、生員、吏典之家，俱一例各免二丁。～《節行事例》（和田、張）
7. 弘治十八年議准，見任及以禮致仕官員，照例優免雜泛差徭。其為事為民充軍等項回籍官員，不許妄行優免。～《萬曆會典》（酒井、和田）
8. 正德十六年，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遞減。無田者，准田免丁。～《節行事例》（和田、張）
9. 正德十六年，今後隨朝文職、內官、內使，俱如舊例，合戶優免。其餘見任方面之家各免丁十丁，知府免八丁，同知以下至知縣等官各三丁，八品至雜職、省祭、舉監、生員、吏典例各二丁，著為例。～《武進縣志》（酒井）
10. 嘉靖初年，在京文武官員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全戶優免。外官優免事例，皆以品從為差。～聶豹，〈應詔陳言以弭災異疏〉（張）
11. 嘉靖八年，在京文武官員之家，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均徭、雜派差役，照依正統元年例行。如有詭寄田糧，靠損小民者，聽撫按參奏治罪。～《武進縣志》（酒井）
12. 嘉靖十年，京官一品免糧二十石、丁二十丁，二品免糧十八石、丁十八丁，三品免糧十六石、丁十六丁，以下遞減至九品免糧四石、丁四丁。外官減半。教官舉監生員免糧二石、人二丁。雜職省祭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糧一石、人一丁。致仕鄉官免本品十之七。閑住者半。～《武進縣志》（酒井）、《圖書編》（和田）、《常州府志》（張）⁴⁵

⁴⁴ 案：「外官半之」一語，僅見於萬曆《武進縣志》。酒井忠夫認為是後世的衍文，參見前引書，頁 203。吳金成，〈國法與社會慣行——以明代紳士「優免則例」為中心——〉，《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二，頁 354，也認為「這裡指摘的『外官半之』，能否不顧明朝原則，在地區獨立施行卻不很分明」。

⁴⁵ 張顯清在文中並未逐條一一註明引用出處，通觀全文，推測此條引自萬曆《重修常州府志》。和田正廣則引章潢，《圖書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90：37a-40a，〈授時任民·編審徭役〉，認為是嘉靖九年十月，戶部題覆大學士桂萼「奏為授時任民事」而提出的版本，經「覆奉欽依，通行各省所屬一體遵守」。桂萼上奏事見《明世宗實

13. 嘉靖十八年，在京文武官員之家，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均徭、雜泛差役，照依正統元年事例，全戶優免。如有詭寄田糧，靠損小民者，聽撫按官參奏治罪。～《實錄》（和田）
14. 嘉靖二十四年，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石、丁二十丁，以下遞減至九品免糧六石、丁六丁。外官減半。教官舉監生員免糧二石、人二丁。雜職省祭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糧一石、人一丁。致仕鄉官免十之七。閑住者半。～《實錄》、《萬曆會典》、《武進縣志》（酒井、和田、張）

上舉各條中，除第 11、13 條內容雷同，都是重申正統元年例，但 11 條其實是誤植外；第 8、9 兩條，同為正德十六年令，但對京官優免卻是一設限、一仍舊例合戶優免；對外官優免的基準則是一在田、一在丁，明顯相悖。經查「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頃」之說，首見於邱濬《大學衍義補》，其後於正德十五年由時任南京吏科給事中的孫懋再次提出，⁴⁶ 翌年二月奉准施行。《節行事例·內外官員優免戶下差役例》云：

錄》118：13b-14a，嘉靖九年十月戊寅。和田氏未見，卻謂該例又見萬曆《大明會典·戶部七·賦役》20：13a，嘉靖九年令。和田氏因此將此例繫於嘉靖九年（參見前引文，頁 101-102, 127 註 26）。查會典嘉靖九年令：「各該司府州縣審編徭役，先查歲額各項差役若干，該用銀若干；黃冊實在丁糧，除應免品官監生員吏典貧難下戶外，其應役丁糧若干；以所用役銀，酌量每人一丁、田幾畝，該出銀若干，儘數分派。」內容雖與「審編徭役」有關，但對官、生、吏典、貧難下戶各應免若干，全未提及。且桂萼之疏以及戶部議覆，俱止針對官吏優免，並未論及「貧難下戶」；嘉靖九年令是否與桂萼之疏直接關聯，尚待釐清。晏文輝修，唐鶴徵纂，萬曆《武進縣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將之繫於嘉靖十年；陳思修，繆荃孫纂，民國《江陰縣續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22：34b-36a，〈石刻記·優免徭役碑〉，亦將此一「均徭例免官吏丁糧則例」，繫於「嘉靖十年十月初二日，奉府帖為授時任民事」。或可釋為桂萼所提，自嘉靖九年戶部議覆後，至嘉靖十年始頒行天下。本文因仍方志說法，稱之為嘉靖十年例。

⁴⁶ 孫懋，字德夫，號毅菴，浙江慈谿人。正德六年進士，歷南京吏科給事中，出為廣東參議，遷副使，謫藤縣典史，久之遷廣西布政，入為應天府尹，坐事忤旨，致仕。參見《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444。孫懋此議見《孫毅菴奏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下：29a-30a，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釐夙弊以正版籍疏〉，其言曰：「三曰革詭寄，……乞勅戶部申明禁例，……若內外仕宦之家，亦必量其官職崇卑，定為優免則例。如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准田免丁。如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此非愚臣之見，先臣大學士邱濬所著進呈大學衍義補中已備言之。」時任南京吏科給事中，參見《明武宗實錄》185：2b，正德十五年四月甲申；《明世宗實錄》1：28a，正德十六年四月辛亥。邱濬之議參見《大學衍義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4：17a-b，〈治國平天下之要·固邦本·制民之產〉。下文引《節行事例》，謂孫懋為南京戶科給事中，當以實錄為準。

正德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戶部為釐宿弊以正版籍事，本部尚書楊題該南京戶〔吏〕科給事中孫懋奏稱：內外仕宦之家，量其官職崇卑，定為優免則例。如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准田免丁。等因。該本部開立前件，議擬優免田糧等項事宜，俱照條陳內事理施行。題奉聖旨：是。都准擬議行。欽遵。

《皇明太學志》卷二，〈典制·賜予·優復〉記有相同文字。⁴⁷ 正德十六年通過的優免則例當為此。

那麼，酒井忠夫所錄正德十六年令，又是出自何處呢？萬曆《武進縣志》卷三，〈錢穀·優免〉如是云：⁴⁸

正德十六年，巡撫都御史羅案驗內開：今後隨朝文職、內官、內使，俱如舊例，全戶優免；其餘見在方面之家，各免丁拾丁，知府免捌丁，同知以下至知縣等官各叁丁，八品至雜職省祭舉監生員吏典例各貳丁，著為例。

嘉靖八年二月詔，在京文武官員之家，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均徭、雜派差役，照依正統元年例行。如有詭寄田糧、靠損小民者，聽撫按參奏治罪。

其中關鍵人物「巡撫都御史羅」若指羅鑒，則其出任總督蘇松諸郡糧儲右副都御史在正德二年至六年間，⁴⁹ 縣志記為正德十六年，單是時間點就不符合。⁵⁰ 另一方面，筆者從方志中也找到一些不同的說法。例如，嘉靖《渭南縣志》卷三，〈風土考三〉所云：⁵¹

⁴⁷ 參見《節行事例》（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頁 476-477；郭鑒，《皇明太學志》（北京：學苑出版社，1996）2：28b-29b。

⁴⁸ 酒井忠夫依據的是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臺北：廣文書局，1979）23：29b-30a，〈江南十一·優免〉，書中註明抄錄自《武進縣志》。酒井氏當時未能得見萬曆《武進縣志》，但他在同為唐鶴徵所纂的萬曆《重脩常州府志》（北京：線裝書局，2003）中找到同樣的記事。本文所引，見萬曆《武進縣志》3：104a-105a，〈錢穀·優免〉，內容較萬曆《重脩常州府志》5：106a-108a，〈錢穀·里徭·優免新舊則例〉更完整。

⁴⁹ 查吳廷燮撰，魏連科點校，《明督撫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355，正德間出任巡撫而為羅姓者僅羅鑒一人，其任免罷復時間參見《明武宗實錄》29：8a，正德二年八月己亥；63：2a，正德五年五月己未；67：15a，正德五年九月壬午；72：7a，正德六年二月丁酉。

⁵⁰ 案：《明武宗實錄》56：2b-3a，正德四年十月丁酉有云：「又議總督蘇松等處糧儲右副都御史羅鑒所陳事宜，其可行者七事。」或許縣志所記，乃是諸「所陳事宜」中不可行的。

⁵¹ 參見南大吉纂修，嘉靖《渭南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3：18b-19b。

茲考檢節年優免事例附載此後，使凡來審編者有所稽焉。……又弘治十七年戶部題稱：今後除隨朝文職、六部、都察院等衙門，本戶雜泛差役，照例全戶優免，其餘見任方面官員之家，各免人丁十丁，知府免八丁，同知以下至知縣等官各免三丁，八品以下至雜職、聽選等官，及舉人監生員吏典之家，俱一例各免二丁。著為定例。等因，題奉孝宗皇帝聖旨：准擬。欽此。又正德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戶部題稱：內外仕宦之家，量其官職崇卑，定為優免則例，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准田免丁。等因，題奉武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四日，建立東宮詔書內一欵：在京文武官員之家，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均徭雜泛差役，照依正統元年事例，全戶優免。欽此。

《渭南縣志》的記載與《武進縣志》明顯不同者有三：

- 一、將《武進縣志》誤作正德十六年的優免則例繫於弘治十七年（即史料 6）。
- 二、正確指出正德十六年優免則例的內容。此條不見於《武進縣志》。
- 三、明記嘉靖十八年令出自是年二月初四日〈建立東宮詔書〉（即史料 13）。⁵²《武進縣志》誤植為嘉靖八年，明顯有誤。

有關弘治十七年優免事例，亦見《節行事例·內外官員優免戶下差役例》：

弘治十七年，戶部為陳言民情以革弊政事。該本部左侍郎王等題，該順天府府尹冀奏，該本部查得舊例：六部、都察院等衙門隨朝官員，本戶雜泛差役，丁差全免。內官免二丁，內使免一丁。及查弘治七年，該辦事吏余彥達奏：京官之家，不拘品秩崇卑、丁糧多寡，全戶優免。方面、知府等官，各免人丁十丁、田糧二十石；同知以下至知縣等官，免人丁五丁、糧十石；八品以下教職等官及監生、舉人、生員之家，各免人丁四丁、糧四石；雜職、省祭官、聽選等官，及吏典之家，各免人丁三丁、糧三石，以勵養廉。等因，該禮部會議，行有司勘酌施行。原無議定，有司遂以為例，輒使遵行。事屬差錯，合無通行各處，今後除隨朝文職、內官、內使丁差，俱照舊例優免。其餘見任方面官員之家，各免人丁十丁。知府免八丁，同知以下至知縣等官各免人丁三丁，八品以下至雜職、省祭、聽選等官，及監生、舉人、生員、吏典之家，俱一例各免二丁。著為定例。題奉孝宗皇帝聖旨：准擬。欽此。欽遵。

⁵² 事見《明世宗實錄》221：2a-5a，嘉靖十八年二月辛丑。

這段文字並非完全精確，⁵³ 但從前一年刑部主事劉喬亦曾上言「乞定優免之額」，意圖限制「京官及方面官三品以上者優免若干，七品以上者優免若干，八品以下者優免若干，其餘丁田悉照民間均派」；⁵⁴ 以及弘治七年辦事吏余彥達所奏，⁵⁵ 都可見在該事例奉准施行以前，有關內外文武官員的優免限額一再成為議題，也確實經歷過一段各行其是的混亂時期。此後的嘉靖十年例，詳載於《武進縣志》卻不見於《渭南縣志》，也間接說明該例未能實施於渭南。不過，就整體趨勢來看，至少到正德十六年以前，文職京官全免均徭、雜泛差役仍屬普遍認知。正德十六年以後，京官三品以上只得免田四頃；嘉靖十年，復改為京官三品免糧十六石、人丁十六丁。而嘉靖十八年重申京官全免之令，由於出自冊立東宮禮成後發布的恩詔，或可解釋為一時的特恩，但據《明經世文編》卷二二二，聶豹，⁵⁶《聶貞襄集》，〈應詔陳言以弭災異疏〉：

臣謹按：見行優免事例，在京文武官員，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全戶優免；外官優免事例，皆以品從為差。載在令典，不啻詳矣。

至少到嘉靖初年，某些地區仍依然遵行京官全免的規定不曾改變。⁵⁷ 劉棟於正德

⁵³ 此文誤將蘭琦作冀綺。案：冀綺，弘治八年正月由南京太僕寺卿陞為應天府府尹，九年七月致仕。參見《明孝宗實錄》96：2b，弘治八年正月辛卯；115：7b，弘治九年七月乙丑。《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872，謂其「歷應天府尹，性質直，有治才，改尹京兆，宿弊盡革，邑人德之」。但據焦竑編，《國朝獻徵錄》（臺北：明文書局，1991）75：30，〈應天府府尹冀綺傳〉：綺字汝華，揚州寶應縣人。成化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累遷應天府府丞、南京太僕寺卿、應天府府尹。已而坐言官論劾，自陳致仕，正德五年八月卒。實錄所記亦然。弘治十七年任順天府府尹者實為蘭琦，弘治十五年任，十八年致仕，參見《明孝宗實錄》190：3a，弘治十五年八月己酉；《明武宗實錄》7：7b，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壬辰。又，戶部左侍郎王指王儼，弘治十五年由戶部右侍郎陞左侍郎，正德元年致仕。參見《明孝宗實錄》188：8a，弘治十五年六月丙辰；《明武宗實錄》13：1b，正德元年五月壬午。

⁵⁴ 參見《明孝宗實錄》200：3a，弘治十六年六月乙巳。和田正廣，前引文，頁95-96，認為該案之提出，與弘治年間均徭、軍需的科派基準已轉移到丁、田有關。惟此案僅止於審議階段，並未施行。

⁵⁵ 余彥達，連江人，弘治間任靈山縣吏員，參見盛熙祚纂修，雍正《靈山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7：40b，〈秩官志〉。

⁵⁶ 據《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914，聶豹，吉安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知華亭，屢遷平陽知府，拜右僉都御史，累官太子太保。後以中旨罷歸。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⁵⁷ 案：〈應詔陳言以弭災異疏〉中，言及福建省官民田糧及福建僧道田租、訴訟事，疏末又謂：「臣甲科舉出身、歷官御史」，故此疏當作於其福建巡按御史任內，時在嘉靖四年至八、九年間（聶豹出知蘇州在嘉靖九年）。參見《明史·列傳第九十·聶豹》202：5336；李銘皖、譚鈞培修，馮桂芬纂，同治《蘇州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70：17a-b，〈名宦〉。

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不久即授編修，此後雖一度外放、兩度丁憂，但在服闋復官後似乎始終獲得全戶優免的禮遇。嘉靖十八年的恩詔，更形同劉棟一家的護身符。劉氏受惠於此，財富迅速累積，合族戶田一時高達一萬三千畝。

嘉靖二十四年（1545），議定優免則例，正式確立京官三品只能免糧二十石、人丁二十丁。⁵⁸ 但顯然未能切實執行，以致於劉棟死後又再全戶優免了三年。⁵⁹

劉棟之後，水澄劉氏又陸續出了幾名進士。分別是劉櫓，嘉靖甲辰（23 年）科；劉毅，萬曆己丑（17 年）科；劉宗周，萬曆辛丑（29 年）科；劉永基，萬曆丙辰（44 年）科；劉明孝，崇禎庚辰（13 年）科。⁶⁰ 除去明亡前夕的劉明孝不論，各人任官履歷如次：

劉櫓，以進士除寶應知縣，旋丁父憂。嘉靖二十七年服闋補黟縣，遷刑部主事，出讞廣西。三十八年擢山東按察副使，備兵青州。三年屆滿，嘉靖四十一年以疾卒。⁶¹

劉毅，萬曆十八年除刑部貴州司主事，十九年奉父喪歸，服闋補原官。尋調兵部武選司，歷員外郎，二十六年陞山東提學僉事。二十九年轉福建右參議，監視建南道。已擢憲副，且告侍養歸，隨丁母艱，服闋。三十七年補廣東參議，巡視海道。已晉糧署副使，署篆兼鹽法數道。四十年陞廣東副使，因攝鹽篆。四十三年陞江西右參政。四十七年陞廣西按察使。天啟元年陞廣西右布政。移病不待報輒歸，崇禎三年卒。⁶²

⁵⁸ 嘉靖二十四年優免則例見萬曆《大明會典》20：19a-20a，〈戶部·戶口二·賦役〉。

⁵⁹ 據萬曆《大明會典》20：16a，〈戶部·戶口二·賦役〉：「（洪武七年）又令官員亡故者，免其家徭役三年。」劉棟死後，劉家又再優免三年於法有據，但若嘉靖二十四年優免則例嚴格執行，則限額止於糧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必不至全戶優免。

⁶⁰ 參見《家譜·選舉表》。又，六修譜〈選舉表·增續編〉有劉應昌，嘉靖乙丑（四十四年）科，榜姓宋，屬武林分宗，仁和縣軍籍，本文不論。

⁶¹ 參見《家譜》第1冊，頁443，〈年表〉；第3冊，頁44-46，〈兩贈公列傳第九附守直公養齋公〉。吳甸華修，俞正燮纂，嘉慶《黟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4：43a-b，〈職官·名宦〉；杜思修，馮惟訥纂，嘉靖《青州府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5）11：2b，〈兵防〉。劉櫓一生最具爭議的，是他任提牢主事時，未能為楊繼盛爭公道。林時對，《留補堂文集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1：4b-6a，〈論·枉做小人論〉即謂：「提牢主事山陰劉櫓特下公（楊繼盛）民監，詔擬罪。……殺人媚人，犬豕不食；默為大臣，素有物望，何亦喪心若？」劉宗周在《家譜·列傳》中亦言：「論者或謂公以比部提牢，會楊忠愍下詔獄，公不及為地，以是為忠愍所憾，意公若有所逢者。其然豈其然乎？語云：守道不如守官，公殆坐是乎？趙端肅公錦嘗為公立傳，辨忠愍詔獄提牢事為受誣，姑俟論定云。」

⁶² 參見《家譜》第1冊，頁485，〈年表〉；第3冊，頁146-157，〈藩臬兩公列傳第二十

劉宗周，甫成進士即丁母憂。服闋，萬曆三十二年授行人司行人。三十三年乞終養，天啟元年起為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年陞光祿寺寺丞，未至，陞尚寶司少卿。三年陞太僕寺少卿。五年擢為右通政，因固辭，削籍歸。崇禎初起順天府尹（正三品），因進仁義之說，又請除詔獄、免新餉，帝不省，謝病歸。九年再召授工部侍郎（正三品），十五年為左都御史（正二品），復以論救姜采、熊開元，革職歸。福王監國，起原官，痛陳時政，劾馬士英、劉孔昭、劉澤清、高傑，又爭阮大鍼必不可用，皆不納，乞骸骨歸。杭州失守，絕食二十三日卒，年六十八。⁶³《家譜》謂其「通籍四十五年，在朝不滿四載」，以讀書講學為志。

劉永基，初知宜興縣，均平徭役。丁王安人憂。服闋補贛縣，擢兵部車駕司主事。連擢山右道兵備僉事，以巡關使者論劾，奉嚴旨削籍。歸五年，崇禎即位，誅逆璫，詔明年戊辰起陝西洮岷道。洮岷即病，病一月卒於署，時為崇禎二年。⁶⁴

劉櫟中進士的第二年，嘉靖二十四年優免則例確立。此例載在《會典》，通行天下，但在各地區實施的狀況並不一致。濱島敦俊就曾指出，萬曆九年張居正清丈之前，海鹽縣「士夫優免尚無限制」。⁶⁵而張居正為行清丈、禁詭寄，曾令

二）。《明神宗實錄》325：5b，萬曆二十六年八月丙子；358：11a，萬曆二十九年四月丙申；461：1a，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己酉朔；494：5b-6a，萬曆四十年四月辛巳；533：12a，萬曆四十三年六月戊子；579：3b，萬曆四十七年二月丁卯。《明熹宗實錄》6：13a，天啟元年二月甲寅。

⁶³ 參見《家譜》第1冊，頁510，〈年表〉；第3冊，頁195-217，〈列傳續編·總憲公列傳第一〉。《明神宗實錄》407：9a，萬曆三十三年三月壬寅。《明熹宗實錄》8：18b，天啟元年三月丙寅；23：10b，天啟二年六月癸未；38：25b，天啟三年九月戊申；55：15a-b，天啟五年正月乙亥。《崇禎實錄》9：4a-5a，崇禎九年三月丙寅朔；15：12b，崇禎十五年八月癸丑。《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833。

⁶⁴ 參見《家譜》第1冊，頁496-497，〈年表〉；第3冊，頁131-146，〈藩臬兩公列傳第二十二〉。《明熹宗實錄》66：16b-17b，天啟五年十二月戊子。《崇禎長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11：24b-25b，崇禎元年七月戊子。

⁶⁵ 參見濱島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會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頁266-273。濱島氏引樊維城、胡震亨等纂修，天啟《海鹽縣圖經》（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6：3a-4a，〈食貨篇·役法〉：「但均田議嘉靖間已有之，至萬曆九年始克舉，則自有說。……一則以此時士夫優免尚無限制，但有田地借蔭在戶下，並不充役。若行均甲，勢必先將免額刪定，然後可將餘田派配，令無縮虧。人即不為阻撓，我自嫌其刻薄。……必待丈量清楚，豁盡虛糧，然後均齊畫一之政可行。此均里美政，直待二百餘年積弊之後，合縣士夫帖然無議之日，又適奉明例通丈田土，機會種種湊合，可以有為。前令蔡公方能成就此大功德于鹽民也。」文中「此時」二字與「均田議嘉靖間已有之」相呼

他的兒子張嗣修調出湖廣江陵家鄉的「賦役丈冊」，赫然發現其中登載了「內閣張、優免六百四十餘石」，與居正名下實有之稅糧七十餘石相距甚遠。多出的五百餘石，或為族人、家僮所有，或為奸豪賄吏胥所混入。嗣修因請盡辭優免以絕禍根。對此，湖廣巡撫陳省除保留居正家的七十四石及其「房族弟姪有官職及生儒人等應免十五石外，其餘狡民以親識里排共九十九名，冒免糧五百餘石，俱據律問罪」。⁶⁶ 此外，鄉紳優免本「不及戶役」，但在江南和浙西，一直到崇禎十三年仍有優免里甲正役之例。⁶⁷ 濱島氏又引天啟《海鹽縣圖經》，指出萬曆二十九年海鹽知縣李當泰於編審之際，「酌定優免，概縣甲科免田三千，鄉科半之，貢途又各有差。監生免田六十畝、生員免田四十畝、異途出仕免田三十畝、吏農免田二十畝，通計免田八萬二千三百畝。各戶免外餘田，與齊民一體編戶當差。如後人文漸盛，即在縉紳免田中多寡通融，不得侵踰八萬二千三百畝之數，虧損小民役田」；⁶⁸ 其優免限額按出身甲科、鄉科、貢途、異途、吏農各有不同，與嘉靖二十四年按京、外官品級高低分別設限，「教官、監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丁二丁。雜職、省祭官、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糧一石、人丁一丁」的規定大異其趣。⁶⁹

應，應指嘉靖四十年海鹽生員賀整的「均甲」議（參見濱島敦俊，前引書，頁 264），但其時嘉靖二十四年優免則例已然發佈，《海鹽縣圖經》卻謂「士夫優免尚無限制」，顯見中央的政策尚未能落實於地方。再查天啟《海鹽縣圖經》6：4b-5b，〈食貨篇·役法·萬曆九年前任知縣蔡初行均甲事宜〉，其中有「但優免之數不定，役田難以取齊；陞里之法不行，各甲何從均派？議將鄉宦田地，科甲出身者各免田若干，貢士生員吏承各免田若干，其餘田地通融均派，於一千六百一十名里長甲內，每甲限田若干，先行准收，次行均甲，又次編審」；同書 9：25a-b，〈官師篇〉記蔡逢時：「公乘丈田後行均甲法，先定士紳免額，次歸併貧里、陞富里，概以畝三百二十受一役」，俱可見萬曆九年以前是尚未設限的。

⁶⁶ 濱島敦俊，前引書，頁 270。又見不著撰人，《萬曆邸鈔》（據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本傳鈔，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藏本），萬曆九年辛巳卷：3a-5b，夏四月，「行丈量法，大均天下田賦」條。

⁶⁷ 濱島敦俊，前引書，頁 233，引《嘉興縣啟禎兩朝實錄》（筆者未見）。語出崇禎十三年戶部尚書李待問奏疏中所引浙江布政使金之俊言：「臣按會典所載，見任官員炤品級優免丁糧若干，而不及戶役。其優免戶役，惟江南及浙西有之。」

⁶⁸ 濱島敦俊，前引書，頁 274，引天啟《海鹽縣圖經》6：6a，〈食貨篇·役法·萬曆二十九年前任李編審事宜〉。此一個別限額應即萬曆九年知縣蔡逢時所定，李當泰更進一步將總額限制在八萬二千三百畝以內，參見註 65。

⁶⁹ 和田正廣認為，此種按科舉、學校等不同的出身，給予不同優免限額的設計，露骨地表現出將鄉紳「身分制化的意圖」；而鄉科舉人優免限額的大幅增加，也代表他們在地方支配階級內部的階層序列中，已與甲科進士一起，得以「科甲」的特權身分，獲得與品官相同的待遇。參見和田正廣，前引文，頁 114, 123。

山陰縣何時開始對鄉紳實施優免限制並不清楚，但至遲到嘉靖四十五年巡按御史龐尚鵬行均役之法時，士大夫之家優免額度已經被列為每歲統計概縣田、丁時必要的考量因素。萬曆《會稽縣志》卷七，〈戶書三·徭賦之屬十一曰均差·均差考〉有云：⁷⁰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寧紹台道左參議程、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整飭寧台兵備兼分巡浙東道副使謝，為均差便民事。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奉欽差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批各道呈詳，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本院批發紹興府申詳，查議過山陰縣里遞吳稻等呈，均徭銀力等項二十五款緣由，……會呈去後，隨據該府申稱：查得前事，先該本府查議通行，申蒙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龐詳批：前呈山陰縣徭役緣由，蒙批：據議，均徭通融編派，隨事酌量，費有常經，民無偏累，而詭寄、花分、冒濫、優免之弊，亦盡革矣。如議，即查照行。

嘉靖《山陰縣志》卷三，〈民賦志·征稅〉亦云：⁷¹

縣徭役初制，每歲分列上中下戶，繁簡量戶編審有差，十年以次輪編。然一人之耳目易欺，編戶之貧富難於悉照，舉措稍失，繁簡不均，民受偏累。頃年兵興之後，役繁民困，庫傳之役尤號難支。嘉靖四十五年，巡按御史龐尚鵬立法均役，每歲通計概縣田丁，約復士夫之家外，量丁派銀，貯於公帑，以待一歲顧直，於是役均而民困甦，時知府楊兆相而成之。

龐尚鵬推行的均役法又稱均平法、十段錦冊法，後來又行一條鞭法。⁷² 按照嘉靖

⁷⁰ 參見楊維新修，張元汴、徐渭纂，萬曆《會稽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7：4b-6a。

⁷¹ 參見嘉靖《山陰縣志》3：18b。龐尚鵬創立的一條鞭法，在山陰得到知府楊兆、知縣楊家相，以及鄉紳張元汴的支持，一時得以順利推行。但日久弊生，「至明末，舊制漸湮」，一直要到康熙六年，才又「按欽頒經費錄與賦役全書，自官府隸役以致驛站緯夫俸薪工食、燭炭紙張等項，皆有額定經制，行令藩司，虛公核算，立石永禁」。參見嘉靖《山陰縣志》3：24b，〈民賦志·糧則〉；高登先修，單國驥纂，康熙《山陰縣志》（民國鈔本，收入《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合肥：黃山書社〕）11：437-438，〈徭役〉；嘉慶《山陰縣志》21：20a-b，〈政事志·壇廟〉，張元汴，〈龐公祠記〉。

⁷² 關於龐尚鵬推行的均平法、十段錦冊法及一條鞭法，梁方仲在〈一條鞭法的名稱〉中，「以嘉靖四十五年巡按浙江監察御史龐尚鵬所奏行的均徭法為例，這個均徭法尚鵬自己亦明明說是仿餘姚、平湖二縣行一條鞭之法。後人亦多稱他為推行一條鞭法甚有力的人。但《紹興府志》則名其法曰“均平法”，而以隆慶元年正月十九日餘姚知縣鄧材喬所奏行的才叫做“一條鞭”。……但尚鵬所行的法，實際上就是一條鞭法」。而「龐尚鵬在題為《釐宿弊以均賦役事》一疏內，他又稱自己所行的法為“十段錦法”。可見在尚鵬的觀念中，一條鞭法與十段錦法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參見《明代賦役制度》〔北京：中華書局，

四十五年龐尚鵬奏准刊行的《欽依兩浙均平錄》，⁷³ 均平銀的編審乃是「通計合用本年額、坐、雜三辦一應銀數共該若干，除官員、舉監生員、吏承、軍、匠、灶等項照例優免，并逃絕人戶免編外，其餘均平科派。折田為丁，每丁該銀若干，某戶該銀若干，一歲應納之數盡在其內。完日將審派人戶花名、銀兩細數，給示曉諭，以便輸納，及造冊繳道，以備查考」。⁷⁴ 既云「照例優免」，有關官員、舉監生員、吏承的部分，理應按照嘉靖二十四年例。再據隆慶二年會稽知縣傅良諫申，該縣因「優免繁碎，名項劇多，比之他縣，甚於霄壤」，其中「水鄉蕩價，內外職官及各竈戶俱優免，止派于民；又加水夫工食、遠驛馬價，止京省職官查照品級優免，而竈戶原與民間一體派徵」，⁷⁵ 可見各縣因應不同民情仍有變通之處，但在當時雷厲風行之際，有關京省職官的部分，大體還是「查照品級」，「照例優免」的。

2008〕，頁 5-7）。梁氏這個說法在他後來發表〈明代十段錦法〉時做出了修正：「均平與條鞭兩個名詞不宜混而為一。萬曆紹興府志記嘉靖四十五年龐尚鵬奏行均平法……其下又云隆慶元年正月十九日餘姚知縣鄧材喬奏行一條鞭法，亦是說由均平轉而為條鞭。世人多謂龐尚鵬為一條鞭法的功臣，然不知其最初所奏行者實為十段錦法，其奏行一條鞭乃仿照餘姚、平湖二縣之法，事在較後。」（同前書，頁 446-447）。谷口規矩雄，〈龐尚鵬的一條鞭法について〉（《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8〕）認為，根據龐尚鵬所上〈節冗費定法守以蘇里甲疏〉以及〈均徭役以杜偏累以紓民困疏〉（谷口氏推測兩疏上於嘉靖四十四年，見是書，頁 320 註 8），他在浙江實施的一條鞭法，包括了均平與均徭兩大項，前者針對名目繁多的里甲公費及上供物料，後者則以均徭雜役為對象，廣泛的實施銀納僱役化。但他也發現，同樣在浙江，同樣涵蓋均平、均徭銀的徵收，紹興府卻稱龐尚鵬的改革為「均平法」，將隆慶元年鄧材喬施行於餘姚的稱為一條鞭法，其間差異在於餘姚縣初行龐尚鵬均平法時，一條化不夠完整，稅糧、徭役項目過多，各項派銀數不同，難免胥吏從中取利；其次是賦役銀納本為免除農民親身赴役之苦，但為了稅銀收納另外設置了「收頭」，反而形成新的禍害。隆慶元年餘姚縣的一條鞭法，不但強化了稅糧、徭役諸項目的一條化與銀納化，稅銀收納採自封投櫃方式，稅銀起解也朝官收官解的目標邁進，可說是相當徹底的一條鞭法。但不容否認的是，在浙江施行的均平法，同時也包含了均徭的改革。

⁷³ 參見萬曆《紹興府志》15：7b-8b，〈田賦志·賦·均平法〉。梁方仲據日本尊經閣藏《欽依兩浙均平錄》1，〈均平錄及均平由帖〉，認為一條鞭法是龐尚鵬於嘉靖四十三年在浙江巡按任內奏請通行天下的。參見梁方仲，《明代賦役制度》，頁 289。梁氏曾撰〈兩浙均平錄之介紹〉，其目收入同書，頁 445，惜筆者未能得見。

⁷⁴ 參見萬曆《會稽縣志》6：13a-15a，〈戶書三·徭賦之屬九曰均平·均平考〉。

⁷⁵ 參見萬曆《會稽縣志》7：6a-7b，〈戶書三·徭賦之屬十一曰均差·一條鞭考〉。又據董欽德輯，康熙《會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10：9b-10b，〈田賦志中·均差〉，此申係會稽知縣傅良諫於隆慶二年所上。

龐尚鵬均役，特別著眼於優免之濫，《明經世文編》卷三五七，龐尚鵬，《龐中丞摘稿·題為釐宿弊以均賦役事》有云：

切惟民間大患，莫甚於賦役之不均；賦役不均，實由於優免之太濫。臣自祇役以來，即議立十段錦之法，通行各府州縣，查將十甲內丁糧，除四甲已經編過外，未編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六年，凡官吏舉監生員軍憲匠丁，係例應優免者，即將應免之數，開列冊前。如或各甲內俱有丁糧，止從一甲內優免，其餘免剩者挨造入冊，與民一體編差。已經見諸施行外。（以下略）

關於十段錦法，萬曆《大明會典》卷二〇，〈戶部·戶口二·賦役〉有更詳細的說明：

（嘉靖）四十四年議准：江南行十段錦冊法，算該每年銀力差各若干，總計十甲之田，派為定則。如一甲有餘，則留二三甲用。不足，即提二甲補之。鄉宦免田，十年之內，止免一年。一年之內，止于本戶。寄莊田畝，不拘同府別府，但已經原籍優免者，不許再免。

此為巡按直隸御史溫如璋條陳議處江南兵食三事時提出的方法，其出發點亦在破除「品官優免太濫，詭寄日滋」之弊。⁷⁶ 十段錦冊不同於黃冊，是一種實徵白冊，由於是按人一丁折田十畝的方式，合一里十甲內「丁、田」總數作為分派徭役的基準，⁷⁷ 即使在黃冊上登記為同一戶的軍戶，實徵冊按其丁田多寡，可能被均分為數個里甲戶。嘉靖四十五年，山陰縣展開均役改革時，劉櫓已死，劉毅尚幼。⁷⁸ 劉氏除了原籍軍戶得以優免的一丁差役外，至多保有數名府縣生員的優免

⁷⁶ 參見《明世宗實錄》543：3b-4a，嘉靖四十四年二月丁丑。

⁷⁷ 萬曆會典中的十段錦冊法，乃是以「十甲之田，派為定則」；龐尚鵬之法則是以「十甲內丁糧」為準。岩見宏，《明代徭役制度の研究》，〈明の嘉靖前後における賦役改革について〉，頁114，認為溫如璋之法源自常州府武進縣早期施行的十段文冊法，其法以丁折田，丁糧並計。梁方仲則指出，龐尚鵬議行的十段錦法，乃是「將田折為丁，與武進縣以丁折田的辦法不同，但實行起來，還是以丁銀之一部歸於田地負擔，不過編派的方式正相反罷了」。參見氏著，《明代賦役制度》，頁445。又據嘉慶《山陰縣志》21：20a-b，〈政事志·壇廟〉，張元忭，〈龐公祠記〉：「今右副都御史南海龐公尚鵬，舊為御史，來按浙，其因革奪予，悉掃故常。知前兩役為病既大且久，乃一破其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亦可證在山陰乃是丁、田並計的。

⁷⁸ 劉毅，嘉靖三十八年生，均役改革時年僅八歲。參見《家譜》第1冊，頁485，〈年表〉。

額度。⁷⁹ 劉氏面對的乃是與劉棟在世時全然不同的局勢，繁重的賦役科徵成為無法規避的沉重現實。《家譜·列傳·成吾排齋冲和雲崗列傳第十七》記劉燝：

公為人輕財仗義，時周人緩急而不責其報。……族兄冽泉以逋糧不貲坐永戍，縣官持之急，無可控告者。公慨然為代償之，遂得免。比公歿，冽泉撫棺慟哭曰：無以報公。其子孫至今談其事，多飲泣者。祖母痼疾，公考南屏方昕夕侍養，而一以家事委公。時劉氏編為十年里甲，公獨總其成，歲執一門徭役。縣官督責諸大姓如束溼。公敏於幹辦，追呼無及門者。

劉燝（子方—謙—圻—鑣—澄—楫—燝）生於嘉靖十年（1531），萬曆九年（1581）卒。冽泉名庶（子方—訓—璵—鐸—憲—森—庶），嘉靖四年生，萬曆二十四年（1596）卒。⁸⁰ 族兄弟二人，一人幾乎因「逋糧不貲坐永戍」，一人則總十年里甲之成，「歲執一門徭役」。同書，〈南塘南園龍淦二峯列傳第十〉又記劉根：

嘗執里中徭役，有同役者多坐乾沒以累公，公所費不貲而終不責其報。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且我已不較，而遺後人較乎？遂并焚其所籍負者名若額，而待其人慊然如故。

〈勿齋玉筭列傳第十八〉記劉根子劉烱：

公自少有至性。始龍淦公大困於徭役，罪且戍，坐繫縣官。公時以儒生請代不得，則發憤讀書，曰：吾得一遇而脫父於阨，吾死無憾。已而為邑令徐孺東首拔，破例免龍淦，人以為孝感。

⁷⁹ 據《家譜》第3冊，頁71-72，〈三學博列傳第十二附贅初公〉，劉宗周云：「相傳國初謫臣公（譚）遇難，遺誠族子孫無讀書應舉，以故族子孫積百三十年無一人列庠序者。或曰：時國法固然，重典之後例不得應舉。至弘治中始得司馬公。方公初試童子時，里中尚無敢以狀舉，至強之乃應。然自司馬公起，而公之弟文峯公（本）繼之，於是從兄弟則有石泉公（楠），再從兄弟則有養齋公（櫟），三從兄弟則有三泉公（集）。其五服兄弟凡四十四人，而以科名及文學子矜顯者十餘人，其三十餘人又多以子孫顯者。」同書，第2冊，頁377, 382, 388，〈選舉表〉，記嘉靖間有貢生劉本、鄉貢士劉集，及官生劉熙。第1冊，頁434, 438, 437, 440，〈年表〉，記劉本，成化二十三年生，歲貢生，歷任項城縣教諭，嘉靖二十四年卒。劉集，弘治十三年生，嘉靖甲午舉人，授廣平府推官，陞徽州知州，嘉靖三十三年卒。劉熙，弘治十一年生，官生，歷任靖江王府長史，隆慶六年卒。劉楠，弘治十六年生，歲貢生，歷任淳安縣教諭，萬曆九年卒。又有劉勳，號二峯，弘治十七年生，太學生，任丹陽縣丞，萬曆十四年卒。劉氏子弟另有就讀太學、府縣學者，以優免丁田數少，本文不一一列舉。

⁸⁰ 案：燝與庶生卒年見《家譜·年表》第1冊，頁454-455, 451。但〈年表〉謂燝卒於萬曆辛亥（1611），晚於庶的卒年。第3冊，頁91-93，〈成吾排齋冲和雲崗列傳第十七〉謂燝「年五十二而卒」，因將燝之卒年修正為萬曆辛巳（1581）。

劉根（子方—謹—玘—鏊—洪—根），正德六年生，萬曆六年卒。焞，嘉靖二十四年生，縣學生，萬曆三十八年卒。⁸¹ 根困於徭役幾坐戍，幸其子焞入縣學表現優異，始得縣官破例免去永戍之罪。又，〈成吾悱齋冲和雲崗列傳第十七〉記劉越：

公少家貧，年弱冠，即事舌耕，且教且學。數舉童子，不利。三十補邑庠，進而食廩二十餘年，方需貢矣，輒報罷。年六十六卒。……晚年會里中有徭役事，人多規弗任，公承乏奔走數年，以是漸荒其故業，致罷諸生。乃公固儒雅，所領各戶官稅復為猾胥奸里朋欺，因坐公乾沒若干。公遂鬱鬱以病終。其後人多原公者，競為公代償之，公家得無恙。

劉越（子方—謹—玘—鑑—濂—栗—梗—鳶—越），嘉靖三十二年生，縣廩生，萬曆四十六年卒。⁸² 焞、根、越、庶分別屬於謙、謹、訓三支，劉越更以縣學廩生親身奔走徭役而負累，反映的正是田多丁眾的水澄劉氏在免去優免大傘後的現實處境。

必須說明的是，明代優免原本只限雜泛差役，稅糧及里甲正役是不能免除的。劉氏長年定居筆飛坊，因屬軍籍，受惠於軍戶不得分戶，全戶僅需負擔一名坊長役。但坊長役重，確實也為劉家帶來不少困擾。嘉靖《山陰縣志》卷三，〈民賦志·征稅〉即云：

右三辦之銀，每歲派徵里甲，其額辦、坐辦經數有定，自初制至今無改也，乃雜辦數繁而費，不經坊都里甲，歲輸支應，供億煩苦，而坊長之撮辦尤號偏重。凡祀饗賓燕之禮，與公私饋給，咸一時取盈焉。吏緣為奸，冒破無藝，濫尤極矣。嘉靖四十五年，巡按御史龐尚鵬議均平里甲，每歲約為定費，量概縣之丁，徵銀輸官，坊都之長惟催辦公課，甲首放歸于農，其有燕祀之費，執事者領銀應辦而已，正供之外，無擾于私家。損上裕下，民德其惠。奏請于朝，通行兩浙。

此所以《家譜·列傳》自劉訓以來即有關於重役的記載。到了劉棟任官期間，劉家應如江南、浙西部分地方一樣，一併免去了坊長之役。劉宗周就曾說過：

臣生之初，見現年里役亦止費二三十金，積至五六十金，今遂有贏至百金者。至一承南糧解戶，則計畝約費三五兩不等，而家盡破矣。獨宦戶偃然處十甲之外，不值現年。臣鄉如此，江南可知。⁸³

⁸¹ 參見《家譜》第1冊，頁443, 467，〈年表〉；第3冊，頁52-56, 104-107。

⁸² 參見《家譜》第1冊，頁476，〈年表〉；第3冊，頁95-96。

⁸³ 參見《劉子全書》17：50a-67b，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二十一日，〈責成巡方職掌以振揚天下風紀立奏化成之效疏〉（未上）。轉引自濱島敦俊，前引書，頁256註28。

宗周生於萬曆六年，其時嘉靖二十四年優免則例早已訂定，但江南各地因應各地方情勢不同，對優免限額仍時有修正。⁸⁴ 有些地方甚至連夏稅秋糧亦一併全免。⁸⁵ 劉棟時，劉家是否免去夏稅秋糧，不得而知。劉棟死後，劉家田產總數達到一萬三千畝，為了規避重役負擔，自不會輕言分戶。然而，到了嘉靖末期，龐尚鵬推行均平法，按概縣丁田徵銀輸官，坊長只需催辦公課，役的負擔較前大為輕簡，但劉家所需承擔的役額卻因之大幅提升。劉燝時已被編為十年里甲，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明末都是如此。

四・照田派役與軍戶分戶

崇禎十年，劉宗周為《家譜》作〈土田志〉，首先開列祖籍為「山陰縣筆飛坊寄軍籍」，其下註明：「額定坊長十名，自劉一海至十海。」這個時期劉氏一族擁有的田畝，去除零星位在會稽者，以及地、山、蕩等項不計外，尚有八千八

⁸⁴ 例如，張顯清，前引文，頁 100，即指出「萬曆十四年優免新例將嘉靖年間“論品免糧”改為“論品免田”，優免內容由糧、丁改為田、丁，且可田、丁互折。新例規定，京官一品免田一千畝，免丁三十丁；二品免田八百畝，免丁二十四丁。以下遞減」。至萬曆三十八年，又「據十四年優免則例“加倍常額”制定了新例，規定京官一品免田一萬畝，二品八千畝。以下遞減」。前者據萬曆《武進縣志》3：104a-105a，〈錢穀・優免〉，乃萬曆十四年「河南道御史傅光宅題准，照品免糧，照糧免田，每田壹畝，准糧叁升為率；人每丁准田貳畝。有丁免丁，不者以田准；有田免田，不者以丁准」（又見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頁 202-203）。後者據姚崇儀輯，萬曆《常熟縣私志》（民國二十三年抄本，收入《愛如生中國方志庫》）3：19a-22b，〈敘賦・優免新則〉，萬曆三十八年新例除將甲科照會典加十倍、鄉科及恩貢生照會典加六倍、選貢照會典加四倍、粟監照會典加一倍外，對未仕者亦有優免，如二甲進士照京官七品免田三千三百五十畝，「三甲進士免田二千七百畝，舉人、恩生免田一千二百畝，貢生免田四百畝，秀才、監生免田八十畝。封君隨品格加六倍免，故官未及三年者照原品級免，武職、掾職照會典免」。唯此二例俱不見載於會典、實錄。酒井忠夫曾針對嘉靖十年例及萬曆十四年例做過考證，參見前引書，頁 201-205。

⁸⁵ 例如民國《江陰縣續志》22：87b-93b，〈石刻記・優免定額禁約夫馬碑〉所云：「直隸常州府江陰縣遵奉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曾勘劄，准戶部咨開：萬曆玖年伍月題奉欽依，通行天下，仍令有司將境內優免仕宦、舉監生員、吏承等項定額，并私用夫馬禁約，刻石衙門，以永杜濫用之弊。奉此，遵依逐款刻示于後。計開：一、查得優免事例，原指雜泛差徭，照丁糧編審者而言。若夏秋正稅，本色、折色、起運、存留，不分軍民官生人等，一體徵納，分毫不得優免。近聞各處鄉官，將自己田地概稱照品優免，有司但知有例，而不知夏秋正糧不在免內，暗昧不察，或詭隨曲從，以致鄉官種無糧之地，小民包無地之糧。見任已免，革職亦免，身故猶免，有相傳數世，子孫全不納糧者。」這種情況絕非江陰特例，更不限於此時。

百餘畝。人丁則「不下數千丁，其貧不能自給衣食者過半」。⁸⁶ 其住居，則一如前文所示，除少數分宗外，⁸⁷「水澄一帶，門第相望，近百餘家，無一他姓錯趾其間者」。這種狀況反映在徭役上，便是水澄劉氏包辦了筆飛坊的十名坊長役。

〈土田志〉隨後詳細開列了該坊額定的十名坊長戶名與各戶丁、田數額。

戶名	一海	二海	三海	四海	五海	六海	七海	八海	九海	十海
戶丁	20	21	21	3	17.9	18	25	19	29	21
田	913	719	785/700	600 餘	1118	654	970	561/600	588	690
地、池	147	49	42	4	59	21	37	26	46	21
山	2251	634			1361		707	503	645	162
蕩	17	21	6	1	182	4	26		10	

*田、地、池、山、蕩俱以畝為單位，畝以下小數略去。

*資料來源：《家譜》第3冊，頁463-479，〈土田志〉。

從戶名劉一海至劉十海可知，這些戶名並非實際人名。各坊長戶的構成如下：劉一海乃第二支長房之後，劉二海為第二支長房分下拙菴公（鏐）之後，劉三海為第二支長房分下，劉四海為第二支長房怡軒公（鐸）分下，劉五海為第二支以下守愚公（澤）分房，劉六海為宗子以後分房，劉七海為第二支質軒公（鑑）以後分下，劉八海為第二支長房分下，劉九海為第二支長房及仲房之後，劉十海則與七海相同，是第二支以後質軒公分房。

十戶之中，除劉六海為宗子以後分房，其餘全屬第二支。上文提及劉訓將兄弟分作三宗，長兄劉謙是為大支祖，次兄劉謹為二支祖，自己則是三支祖。劉謙長子坦後來進承大宗，成為宗子；⁸⁸ 劉訓一支則在明末呈現單弱之勢。⁸⁹ 〈軍宗

⁸⁶ 參見《家譜》第3冊，頁421-422，〈典禮志·本宗義典〉；頁481-482，〈土田志〉。

⁸⁷ 據《家譜》第1冊，頁397-408，〈世表〉，及第2冊，頁359-373，〈分宗年表〉，劉氏分宗有夏履橋分宗、西小路分宗、紫金街分宗、江橋分宗與貴籍分宗。其中夏履橋分宗乃「華五（子名，瑞吉次子，子方親弟）之後，徙本縣夏履橋鄉，距城西南七十里而遙」，與子方之後原本就不同支。參見第1冊，頁75-76，〈義例〉。

⁸⁸ 案：水澄劉氏以文質為始遷祖，文質有二子，瑞卿、瑞吉。瑞卿為大宗，瑞吉為小宗。瑞卿生三子，子才無子，子華、子全俱一傳而絕，遂以瑞吉長孫謙之長子坦「進承大宗」，三子圻之後為大宗餘支。參見《家譜·世表》第1冊，頁81, 91。

⁸⁹ 案：劉訓有四子，瑀、璵、璉、璵，是為第三支，惜此支人丁消乏，瑀三傳而絕，璵一傳即止，璵亦不過四傳而絕，僅璵略有後，惟至第十五世亦僅餘八人，十六世以後不見載於譜，或至是而絕。參見《家譜·世表》第1冊，頁82, 116-119, 330-334, 396。

于志嘉

卹典〉言：「故事三宗鼎足，一切湯沐之供竝無軒輊。近者日涉（訓）房暫處單弱，供事獨殷，族議量紓其力之半，而以素菴（玘）代」，說的就是明末由於第三支單弱，因此改由二支長房（即劉玘之後）代其分擔一半的軍裝湯沐。由明末十名坊長有九戶均為二支之後，亦可證二支之繁盛遠遠超過長支、三支。而二支中又以長房劉玘之後為最盛，玘有四子，鐸、鉞、鏊、鑑。劉棟為鐸次子澤之長子，宗周為鐸長子濟之後，二人俱屬第二支長房。⁹⁰

以第二支為主的十坊長戶，各戶人丁多在二十名上下，最多的是劉九海戶丁二十九名，最少的是劉四海僅三名。劉五海戶的戶丁甚至不是整數，其數為一十七名九分。十戶戶丁合計一百九十四名九分，遠較宗周所謂的「不下數千丁」為少。關於戶丁，樂成顯曾指出：

明清時代戶丁一語的含義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指一戶之下的成丁男子。第二，指大戶之下析產而未正式分戶的子戶而言。第三，從賦役制度方面說，戶丁一語亦具有職役之意。

對於明末《實錄》中，有三條在人口數字之後記有「半」字，樂成顯亦提出他的看法：

“半”字，即是半丁之意。這裡的丁乃是一條鞭法實行之後所編之丁，實質上它已不是人口統計單位，而是一種賦役核算單位，所謂“半丁”即“五分丁”。當時不但有“五分丁”，還有“二分丁”、“三分丁”等等。由於明末戶籍制度的混亂，各地戶口統計標準不一，或只記男子及婦女大口，而不記婦女小口；或男子婦女大小口并記；或只記一條鞭法中所編的丁數，等等。⁹¹

從劉氏實際人丁不下數千丁，水澄一帶門戶近百餘家，戶丁數卻達一百九十四名九分來看，劉氏戶籍資料中的「戶丁」，更可能只是一種賦役核算單位。這與一條鞭法施行之後，丁差逐漸變成銀差，地方政府往往量田編丁，丁成為一種銀差核算單位有關。⁹²

⁹⁰ 宗周世系為子方—謹—玘—鐸—濟—槃—焯—坡—宗周，參見《家譜·世表》第1冊，頁81-82, 92, 166。

⁹¹ 以上參見樂成顯，《明代黃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295, 310-311。

⁹² 這種情形在清初編審冊中更是明顯。樂成顯指出：「清初人丁的編審原則各地很不相同，有按等則編審的等則丁統計法，有按戶編審的戶丁統計法，有量田計丁的田丁統計法，有以田賦折丁的糧丁統計法，還有朋丁統計法等等，……由於人丁多是折算而來，所以最後得出來的往往并非整數。」參見樂成顯，前引書，頁236。

戶丁之外，各戶所有田、地、池、山、蕩數額多寡不一。茲以劉一海為例，開列如下：

田九百一十三畝零，地、池共一百四十七畝零，山二十二頃五十一畝零，蕩一十七畝零。會稽寄戶在外。錄祭產等于後。

大宗祠祭產：聖字號祠基地一畝二分一厘九毫、洪字等號田六十畝九分一厘六毫。

始祖三世祭產：芥字等號田九畝九分三厘二毫、發字號石橋塢始祖三世葬域山二畝三分。

芳齋府君軍產：昃字等號田二十畝五分三厘八毫。

芳齋府君三世祭產素菴房得分：戎字等號田二十二畝一分八厘七毫、景字號屋基地三厘九毫、蘭字號朱家塢葬域山八畝三分。

怡軒贈公祭產：元字等號田三十畝八分九毫、商字號蕩八畝、寶字座山葬域山六十畝九分。

守直府君祭產茅山府君附：伐字等號田一十三畝七分零。

三山府君祭產：能字號田二畝八分零。

兼峰贈公祭產：壹字等號田九畝八分零、敢字號池溜二畝七分零、敢字等號地十畝九分六厘八毫、初字號山五十一畝九分三厘四毫、會稽乃字號獨菱葬域山三畝九分零。

京兆贈公祭產：會稽水字等號田一十八畝六分零、葬域坐龍字號田中。

秦屏府君祭產：敢字號田十三畝八分零、初字號山四十五畝九分零。

義產：忘字等號田十八畝七分零、另貯田價一百五十兩。

劉一海戶下除在山陰的田、地、池、山、蕩各若干外，另有田產在會稽，但以寄籍會稽形式，其田數不計入山陰劉一海戶下。該戶另有祭產、軍產與義產，其中以芳齋為名的軍產二十畝零，是崇禎六年恢復「正租田」後，合「伴送田」的總額數。這部分應是不需繳納稅糧的。⁹³ 義產則在田十八畝零之外，另有田價一百五十兩。⁹⁴ 各項祭產中，有標明為「會稽乃字號獨菱葬域山」及「會稽水字等號

⁹³ 據《家譜·典禮志·軍宗卹典》第3冊，頁419-420：「凡軍租交贈，積自十年，例不科糧。」

⁹⁴ 案：明代義田、祭產有優免之例，如陳仁錫，《無夢園初集》（明崇禎六年刻本，收入《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合肥：黃山書社〕），〈駐四·義田建坊記〉：「崇禎三年二月以宣詔歸，計通籍八載，叨列日講，荷沾賜鑑，兼積俸金，計有六百餘兩，契買附郭官田三頃，……另置買義庄，重修故祖忠諫都憲諱瑀牌坊。嗣後日久，遞傳本族堪任者，

田」的，顯示該戶持有的祭產也是分散在山陰、會稽兩縣的。

再細看十戶內容，崇禎末年，水澄劉氏在山陰擔負的還不只筆飛坊十坊長役。⁹⁵ 例如，劉三海戶下除開列戶丁二十一名、田七百八十五畝零，地、池、蕩各若干外，「另田七百畝奇，新分出萬安坊二、五甲」。劉八海戶下則記有戶丁十九名、田五百六十一畝九分零，地、池、山各若干外，另有田六百畝零，「分出上植坊七甲」。劉四海的情況比較特殊，「戶丁三名，原田六百餘畝，暫改出美政坊四、九甲，今存戶田六畝零、地四畝、蕩一畝零」。⁹⁶ 此番挪移，乃是因

遵依定例，世為公產。上諸各臺，撫院曹批：……仰蘇州府轉行長洲縣，將陳全戶下義田二百七十六畝、蕩二十六畝三分，併仁字二圖義庄一所，入冊給帖，照例優免。」鈴木博之，〈明代徽州府の族產と戸名〉，《東洋學報》71.1/2 (1989)：11-12 指出，明代家族以墓祭、義莊、宗祠為名開立的總戶，常以「帶管戶」的形式編入里甲，需辦納稅糧、負擔雜役，但無需承擔里甲正役。濱島敦俊，前引書，頁 246-247, 259-260，則以嘉靖末年平湖縣人陸果所設義田與役田為例，指出明代義田一般皆得優免；但也有不求優免，自願應役的，如嘉善人陳龍正、太倉人王偉。近藤秀樹，〈范氏義莊の變遷〉，《東洋史研究》21.4 (1963)，亦指出明初范氏義莊「每歲所收租利，止將輸納夏秋二稅，供給馬站等項支用，尚猶不敷」；至嘉靖三十五年始得優免田賦之半。天啟五年、崇禎四年兩度新增義田，俱「造冊呈憲鈐印，准免雜役徭役」。可見優免的內容有時因人因事因地而異，但大抵以優免雜泛差役為主。崇禎十年，劉一海戶下只有義產十八畝七分零，另貯田價一百五十兩。到了崇禎十六年秋八月，「劉氏義田告成」。《劉子全書·年譜下》40 下：23a-b 云：「先生於天啟間著義田權輿說以風族人，自此歲有輸將，復佐以子母，凡二十年，共置田百畝，……詳具事宜示後人，名曰孝義傳芳。」〈孝義傳芳〉與〈義役記事〉（詳下文）同樣，俱見於《劉子全書及遺編》（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上，頁 24，〈目錄〉，收在「劉子討次羣書」下開載之「哀纂·水澄劉氏家譜」下，惜有目無文，筆者未能得見。但《劉子全書遺編》6：33a-34a，有〈義田引孝義傳芳〉，當即所謂〈孝義傳芳引〉。

⁹⁵ 據《家譜》第1冊，頁35-36，〈家譜目次〉：「年表」下開列有「增二編」、「三編」、「四編」；「選舉表」、「誥敕」、「贈言」下有「增續編」、「再續編」、「再續後編」；「旌典」下有「增再續後編」；「世家列傳」、「內傳」下有「增續編」；「祖訓」下有「增後續編」；「典禮志」、「土田志」下則有「增再續編」、「再續後編」。第3冊，頁482，〈土田志〉於宗周崇禎十年「附述」後，載有劉正誼乾隆六年「附識」，其言曰：「增再續編：誼按：原編統刻宗祠、祭產、軍產、義產、并合族祭產。滄桑以後，增減不一；續編所載，亦互有異同，難以作準。右據蕺山公總數重刻，不忘舊也。再續所編，但據大宗祠現在輸糧戶管詳細刊刻，捐置年分不拘前後，從其類也。至各房祭產，或昔有今無，或昔無今有，以及增減不齊之處，聽本家自行核實續刊。」筆者以為，崇禎十年劉宗周作〈土田志〉時，劉氏尚只有「額定坊長十名」，此後數次重修，陸續增改，《家譜》雖謂「據蕺山公總數重刻」，其實雜入了後續補入的資料，以致留下「新分出」、「暫改出」等字樣。但究竟何時補入，確切時間不詳。

⁹⁶ 據嘉靖《山陰縣志》1：11b-12a，〈疆域志·坊里〉，上植利坊為西南隅六圖，美政坊為西南隅七圖，筆飛坊為西北隅五圖，萬安坊為西北隅十二圖。嵇曾筠等修，雍正《浙江通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21：21b，〈祠祀·紹興府〉稱上植利坊為「上植坊」。

為均役法下，山陰編役係以全縣丁田為一體，一甲有餘者留作二三甲之用；不足者，得提他里之甲以補之。⁹⁷ 由劉一海至劉十海，扣除劉四海戶，再加上萬安坊二、五甲、上植坊七甲以及美政坊四、九甲，崇禎末年的山陰水澄劉氏總計負擔了十四名坊長役。

關於這十四名坊長役，《劉子全書》卷四〇，〈劉子年譜錄遺〉有云：

越郡縉紳大家不值繇役，附在十甲之外，名曰「附甲」，致勢家田連阡陌，萬畝不當差，而細民以百畝值役者有之。獨先生族自族兄方伯乾陽公及先生不立附甲，與通族一體當差。戶田八千畝，執筆飛坊十甲，不他徙，然視細民懸甚。先生每於冊期，倡均役之說，當事者不能從。歲在辛巳（崇禎十四年），復屆大造黃冊，先生復倡議曰：「請自某始。」邑令韙之，將行之通郡諸紳。無何，先生赴召北上，諸紳各中變，遂格不行。而邑令以均役發自先生，欲以劉族八千畝分二十甲。族人大不服，曰：「均役，通郡事也。豈獨予劉，而以予劉分細民之謗哉？」諸紳咸不平，出公啓爭。邑令乃減六甲，定為十四甲。明年，先生罷官歸，時先生已執筆飛一甲役，均出者應族人趨辦。族人曰：「均役之議倡於公，公可逃役乎？」先生又役昌安三甲。計先生戶田百畝，執兩年繇役，視細民之不均抑又甚矣。然先生供命惟謹而不辭者，蓋其通細民肥瘠為一體，其心實有所不容已已。先是，均役議定，族人詬先生曰：「為法自敝，一至於此。」既而曰：「未嘗非至公之心。」久之，輿情大歡，先生乃筆其始末，為〈義役記事〉。

浙江自天啟元年以後，有將鄉紳承役田土編成「官里」，由官戶自行負責稅糧之催徵、解運者。⁹⁸ 例如嘉興縣，合官里及民里共三百六十里，每甲田二百一十畝，合計承役田為七十五萬六千畝。另有十萬八千畝為優免田土，則均分為三百六十分，「掛各里各甲之後」，其稅糧之催徵由各該官、民里負責。崇禎四年，因各甲田畝數過低，將官、民里數由三百六十里縮編為三百里，各甲畝數得以提高到二百四十畝。不足之六十里則由過去掛於各里甲之後的免田充抵，編作「免圖」，

⁹⁷ 以海鹽為例，天啟《海鹽縣圖經》6：7a-10a，〈萬曆三十九年前任喬編審事宜〉即云：「本縣推收之法，大都以本圖田多為主。客圖田少，即將客圖之田收并本戶。如一甲有餘，即挨順割補二甲；本圖有餘，方挨順割補隣圖。」

⁹⁸ 案：南直隸各地則自隆慶年間始，多有將士夫之田獨立出來另設「官甲」者，應納錢糧由官戶指定「知數家人」（紀綱之僕），「自辦、自比、自收、自兌」，藉以免去民戶催徵之苦。參見濱島敦俊，前引書，頁234-236, 257-258。

稅糧催徵由官戶知數家人承擔。到了崇禎十四年，又一改「官圖」、「民圖」、「免圖」三者並存的結構，另以官戶田設立「附甲」。《嘉興縣啟禎兩朝實錄》有云：⁹⁹

崇禎十四年，知縣杜渭陽設立附甲，將官戶田附於十甲之外。客籍寄庄，混免差徭，編審時田在甲中，編審後田收甲外，里胥積蠹，賣富差貧，弊竇滋甚。

杜渭陽於崇禎十四年至十六年間任嘉興知縣。¹⁰⁰「附甲」運作方式不詳，但其形式與天啟元年「掛各里各甲之後」相類，都附在十甲之外，目的都在維護縉紳體面，保障官戶不受重役之苦。¹⁰¹ 山陰亦有類似作法，但劉毅與劉宗周卻放棄此一權益，任由己田編入十甲之內，與合族一體當差，這與當時部份東林士人倡議均田均役有關。¹⁰²《劉子全書》卷二二，崇禎元年，〈正學名臣丁長孺先生墓表〉即云：

⁹⁹ 轉引自濱島敦俊，前引書，頁294。上文有關嘉興均役的改革，詳見是書，頁284-296。

¹⁰⁰ 參見司能任修，屠本仁纂，嘉慶《嘉興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18：27b-28a，〈職官〉。又據葛振元修，楊鉅纂，光緒《沔陽州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9：11a，〈人物·宦績〉：「杜渭陽，字南谷，以進士授嘉興縣令。縣糧重，民有積逋，又多權貴，素稱難治。渭陽執法嚴明，權貴斂迹。」與《嘉興縣啟禎兩朝實錄》評價兩極。

¹⁰¹ 案：崇禎十四年嘉興設立「附甲」，其運作方式不詳。同為浙江人（海寧）的朱奇齡，在《續文獻通考補》（北京：北京圖書館，2004）19：16a-b，〈田土補·編審〉論及「附甲」，曰：「或圖內有官田，無論多寡，開總數列于十甲之首，其下仍細開承佃花戶，謂之附甲，則永無乾沒之患矣。」但不論列在十甲之首，抑或掛於里甲之後，總之在十甲之外；重點在將官戶田與民戶田區分開來，不得混免差徭。濱島敦俊曾指出，鄉紳優免限外之承役田土，一般是需要負擔糧長（解戶）役的。但解役有輕重，在海鹽，鄉紳只應貼役，不任「運頭」；在嘉善，則需實際提供勞役，稱作「批頭」；湖州鄉紳只需承擔南糧輕運；嘉興、秀水則以為鄉紳只需負擔解銀。參見《明代江南農村社會の研究》，頁286。

¹⁰² 田中正俊，〈民變·抗租奴變〉，《世界の歴史 11：ゆらぐ中華帝國》（東京：筑摩書房，1961，1979新訂版），頁54，指出東林本非政黨組織，鄉紳之外還包括武弁、商賈、技藝、罪徒等當時各種新興的庶民層。其中心人物固然是一群不論在朝在野都採取批判立場的士大夫層，但從他們身上也可以看到一些時代特徵：一、出身中小地主層或商賈之家，其地主支配隨著明末社會的進展而不安定化，又因王朝權力對收奪的強化而逐漸沒落；二、自知難以經由舊有的「士大夫的支配」衝破社會危機，難以期待為一家將來的存續繁庶帶來希望；三、支持對都市的新興庶民勢力以及農村中小農民層的主體發展有利的政策，藉以轉換或維持自己的歷史社會地位。有關東林人士支持並推動均田均役改革事，詳見濱島敦俊，前引書，頁460-479。

吳俗善逋賦，以鄉紳家悉免繇，而富民復事詭寄，獨累貧丁，賣妻鬻子女以供追呼，有斃命箠楚者。時朱元寧以司成家居，倡均繇之議，大為梓里譁。謀之先生，先生曰：是殆難以口舌爭也。因先自計田占役，與編戶等。譁者口塞，吳中役法自此少變。

朱元寧為文寧之誤，即朱國禎，烏程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初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年陞簡討，二十八年典福建鄉試。二十九年編審時，國禎正以告病養母家居，因目擊時艱，提出均田條議，在地方幾釀成暴動。幸得丁元薦支持，並且建議他主動「計田占役」，¹⁰³ 才有天啟元年編審時的成功。¹⁰⁴ 朱國禎、丁元薦、劉宗周俱列東林黨人榜；¹⁰⁵ 劉毅則與朱國禎同榜進士出身，對於朱國禎均田之說，顯然是以行動支持的。

其時劉氏戶田八千餘畝，分為十甲，一甲有田八百餘畝，遠遠超過山陰一般里甲的水平。劉宗周多次倡為均役之說，希望能與合縣人民同等待遇，但當事者礙於反對聲浪甚大，無意施為。崇禎十四年大造黃冊，劉宗周再倡均役，當時山

¹⁰³ 案：濱島敦俊，前引書，頁 239，引朱國禎，《朱文肅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331，〈救荒略·答曾父母書〉所云：「目下某之田，自祖遺、續置、母弟寡妹兒婦奩產，并縣主批准小墾沈潛七佰餘畝之數，共二千二百之零。除優免外，該充四名，願註二差。」當即指此。其中「四名」指四里長役，「二差」指二糧解役，參見濱島敦俊，前引書，頁 315。

¹⁰⁴ 朱國禎自萬曆二十九年「坐均田得罪」至最終獲得成功，其間事蹟詳見濱島敦俊，前引書，頁 466-473。朱國禎，《湧幢小品》（上海：中華書局，1959）14：315-316，〈均田〉自云：「初一冊為辛丑（萬曆二十九）年。第二冊為辛亥（萬曆三十九）年，合郡公議已定，余懲往事，不發一語。且法原非一人所得主，亦未有久而不變者，我亦何成心之有？最後縣主曾蘭若紹芳來問，只駁宦戶貼銀一款應之。曾不知何故，臨期仍主均田，恨乃益深。第三冊，縣主曾有庵國禎暇時偶談及，余曰：罪魁也，何敢言。惟我父母，政成將內召矣，再做一篇好文字，終之造福在此，不朽功業亦在此。有庵默然，遂精心求之，以均之一字為主，順人情，從中略為參酌，不一月竣事，上下帖然。」曾國禎，萬曆丙辰（四十四年）進士，次年任烏程知縣。「辛酉（天啟元年）編審，善用均田之法，未事而密察，胥吏不及那移；當事而速定，公正不得需索」。參見劉沂春修，徐守綱纂，崇禎《烏程縣誌》（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5：15b，〈秩官·縣令〉。丁元薦字長孺，湖州府長興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湧幢小品·均田》記丁長孺：「是時許敬庵師（許孚遠）亦深為余危之。余曰：事已然，無可奈何。第後有言入師耳者，幸以理裁。惟丁長孺公深主其說，且屢為解於許師。」可見二人關係深厚，理念相同。

¹⁰⁵ 參見溝口雄三，〈いわゆる東林派人士の思想—前近代期における中國思想の展開（上）—〉，《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75（1978）：300-301，〈附表2〉。

陰縣知縣乃是婺源人汪元兆，¹⁰⁶ 他以劉族八千畝分作二十甲，同時希望將該法行之通郡諸紳。不巧宗周於此時被召北上，山陰諸紳不願配合，劉氏族人亦皆不服，最後改定為十四甲。劉氏十四甲役於焉定案。

崇禎十五年，劉宗周被罷，翌年六月回到山陰。¹⁰⁷ 他原本就負擔了筆飛坊一甲役，在族人的壓力下，又額外承擔了昌安三甲役。昌安為宗周所居之里，¹⁰⁸ 昌安三甲不見於上舉諸甲中，或為因應各里甲丁田總數時有變動，每年推收的對象亦隨之變動之故。當時山陰里甲田額究為多少，由於缺乏明確史料，只能略作推估。嘉靖《山陰縣志》卷一，〈疆域志·坊里〉謂山陰坊里數明初「內外總二百九里。嘉靖二十年，知縣許東望會造黃冊，於二十九都內申明豎立一里」，合計二百一十里。「後來逢大造之期，通移轉換」，此增彼減，但總數維持不變。¹⁰⁹ 其田、地、池、山、蕩數則據萬曆十三年清丈所得，為原額田六千二百一十七頃四十七畝零、原額地五百二十七頃五十七畝零、原額池三十七頃四十三畝零、原額山七千七百七十九頃八十八畝零、原額蕩五百九頃三畝零。¹¹⁰ 均為二百一十里，每里不過田三千畝，每甲則不過三百畝。¹¹¹ 劉宗周戶田僅百畝，屬「中人之產」，¹¹² 卻承擔二甲役，難怪要說他是「視細民之不均抑又甚矣」。

¹⁰⁶ 汪元兆，一作汪兆元，崇禎十三年至十六年任山陰縣知縣。其後任錢世貴，崇禎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參見康熙《山陰縣志》18：4b，〈職官志〉；嘉慶《山陰縣志》9：8a，〈職官〉。嘉慶志 12：6b-7a，〈名宦·汪兆元〉，謂其「催科逋負者唯諄諄勸諭，不先刑」，可見其於賦役改革用心之處。

¹⁰⁷ 據《劉子全書·年譜下》40 下：9a-22b，宗周於崇禎十四年九月甲申起改吏部左侍郎，十一月丙申疏陳前罪，乞收回成命，不允。十五年正月復以病請，仍不允，乃於五月出發，八月癸丑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甲寅拜命，閏十一月己未奉旨革職，十二月壬申辭朝，崇禎十六年六月抵家。

¹⁰⁸ 崇禎十三年，宗周「建立社倉於所居之里」，「書其事宜為昌安里社倉記」。參見《劉子全書》24：29a-35b，〈昌安社倉記〉；40 下：8a-b，〈年譜下〉。

¹⁰⁹ 參見嘉靖《山陰縣志》1：11a-b，〈疆域志·坊里〉；康熙《山陰縣志》1：104，〈疆域志·坊里〉。

¹¹⁰ 參見康熙《山陰縣志》10：382-385，〈田賦志·征稅〉。

¹¹¹ 案：山陰地、池、山、蕩數額甚高，但賦則甚低。例如原額田六千二百一十七頃四十七畝零，每畝役銀自九分八厘至五分五毫不等；原額山七千七百七十九頃八十八畝零，每畝役銀三厘三毫；粗估山銀不及田銀總額百分之五。又，明末江南均田均役，大抵一甲田數多落在三百畝前後，如嘉善為二百五十畝，海鹽為三百二十畝，嘉興為二百一十畝（天啟元年。崇禎四年改為二百四十畝），秀水為三百畝。參見濱島敦俊，前引書，頁 247, 273, 290-291。

¹¹² 根據時人之認知，江南地區有田百畝屬「中人之產」，田十畝為自耕農進行再生產的底限。十畝以下者編為里甲之「帶管戶」，無須負擔里甲正役，但有丁糧者須承擔雜役；亦

那麼，崇禎末年水澄劉氏優免的情況又如何呢？〈土田志・優免〉下開：

一丁一土，該二錢四分三厘一毫。自東事起，以後舉監而上盡行停止。

其後又對「東事」所造成的影響，進一步說明：

乃者遼東用兵無虛日，又流寇自江以北雲擾七八省亦幾十年，疊征疊派，視前日何啻再倍。讀近日詔書曰：暫借吾民一年。可為痛哭。宗周輩遭際時艱，恨頂踵未捐，敢言恩澤如故事，而門祚亦已日衰矣。

根據劉宗周自己附上的山陰縣「賦則」，「正項」中，「市丁」一丁，納銀一錢四分二厘；「湖田」一畝，納銀九分八厘、米三升六合三勺。所謂「一丁一土，該二錢四分三厘一毫」，應指每優免人一丁、田一畝，折合銀二錢四分三厘一毫。¹¹³ 東事爆發之前，雜職例免一丁一田、舉監生員例免二丁二田，內外官自一品至九品優免丁田各有差。一戶之內究竟可免多少役銀，只要掌握戶內職官品級、生員、吏承人數，很容易計算得出。萬曆四十八年，為助遼餉之故，所有職役優免一切扣解，崇禎《海澄縣志》卷四，〈賦役志・田賦考・外附徵・遼餉〉有云：¹¹⁴

職役優免：萬曆四十八年奉文扣解助遼。天啟元年免解，天啟二年以後俱扣解。至崇禎六年，因職役優免缺額，奉布政司行文，遞年俱照崇禎元年扣解銀數為準，不許減少。年定額銀四百五十五兩六錢一分五釐八毫。

生員優免：原無扣解，至崇禎三、四、五年方行盡□扣解。崇禎六年起，准復優免免解。

有以十畝以下免役者。參見濱島敦俊，前引書，頁 229；鶴見尚弘，〈明代之畸零戶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7.3(1964)：43-44, 49-51。又，溝口雄三，前引文，頁 167，引陳龍正，《幾亭全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27：1a-8b，〈政書・鄉籌・辛未均役條議〉，其中係以千畝前後為富戶，二百畝前後為中戶，百畝前後為中下戶，十五畝前後為下戶。溝口氏認為，下戶包括了自耕農、半自耕農和佃戶層。

¹¹³ 宗周所列賦則正項，包括 1. 市丁一錢四分二厘，2. 湖田九分八厘、米三升六合三勺，3. 中田八分八厘、米三升一合三勺，4. 下田八分六厘、米三升，5. 山田七分六厘、米一升五合，6. 江田六分七厘、米二升一合六勺，7. 天田五分五毫，8. 湖中地四分一厘，9. 山地三分九厘，10. 天地一分九厘，11. 池一分五厘六毫，12. 山三厘三毫，13. 蕩六厘三毫。（以上，「湖」指鑑湖鄉、「中」指中水鄉、「下」指中水鄉下則、「山」指沿山鄉、「江」指江北鄉、「天」指天樂鄉。天田亦徵本色米，《家譜》漏記。參見嘉慶《山陰縣志・政事志・田賦》23：1b, 2b。）顯然，計算優免額度時，田是以賦則最高的湖田扣算的。

¹¹⁴ 參見梁兆陽修，蔡國楨纂，崇禎《海澄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4：25b-26a。

可知扣解職役優免自萬曆四十八年試行，天啟元年一旦免解，天啟二年以後形成慣例。¹¹⁵ 生員優免扣解則始自崇禎三年，¹¹⁶ 最初以三年為期，其後一再展延，崇禎十年時再度扣解，此所以宗周作〈土田志・優免〉，有「讀近日詔書，曰：暫借吾民一年」之語。¹¹⁷ 儘管如此，山陰劉氏扣除所有地、池、山、蕩不計，尚有田八千八百畝，若以三百畝為一甲，至少可分出二十九甲。汪元兆原擬將之分為二十甲，已經較一般平民百姓條件優渥得多，但仍遭拒絕。其後分作十四甲，每甲田數仍超出一般的一倍。是其時政府雖已完全扣除鄉紳優免之額，實際施行之際，鄉紳的既得利益還是相當程度受到保障的。

綜合上述，不難理解水澄劉氏自山陰縣推行均役法以後，至少在實徵冊上已經被劃分為十個坊長戶；崇禎十四年更因劉宗周之請，增加至十四名。就此點而言，桂萼想要讓「軍匠開戶」的理想，隨著十段法、一條鞭法的推行，隨著實徵冊取代了黃冊的作用，變成是理所當然，似乎也沒有必要再特別提出來討論。然則，也正如劉宗周〈軍宗卹典〉所示，水澄劉氏在被劃分為十個賦役徵收單位的同時，仍然面對了同一個軍籍，承充同一名烏撒衛軍役；儘管不須派人親身赴衛，仍不免於軍宗湯沐的負擔，謙、謹、訓三支且基本上延續了明初以來的規範，各自承擔著三分之一的軍裝義務。僅在明末因應第三支過於單弱，改由二支長房代其分擔一半；但相較於各支實際人丁數比，仍是極度不均衡的。在這種情

¹¹⁵ 又見畢自嚴，《度支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堂稿〉1：31b-32a，〈遠餉不敷濟急無奇疏〉：「一、為優免丁糧。原議京外文武職官、舉、監、儒、吏人等優免丁糧，自天啟二年為始，仍行徵收，扣解充餉，惟生員照舊優免，不在扣解之內。」

¹¹⁶ 據《明熹宗實錄》58：24b-25b，天啟五年四月辛丑，戶部尚書李起元以餉額出入虧欠，轉輸接濟惟艱，奉旨會同九卿科道集議，所列十三款中，其一即「不准監儒雜流優免」。但生員優免實際要到崇禎三年才開始扣解。又見畢自嚴，《度支奏議》，〈新餉司〉10：91a-94b，〈覆陳兵科條議措餉疏〉；〈堂稿〉11：44b-45a，〈條議理財足用六款疏〉；〈堂稿〉12：12a-b，〈覆議原題軍興足用六款疏〉。

¹¹⁷ 案：正文所引崇禎《海澄縣志》，謂「崇禎六年起，准復優免免解」，該志乃崇禎六年刻本。馮夢龍纂修，崇禎《壽寧縣志》（據明崇禎十年刻本攝製，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捲）上：26a-b，〈賦稅・借扣〉則云：「崇禎三年奉文：為遵奉明旨，條議理財等事。全扣生員優免助遼銀二百九十五兩九錢三分三釐九毫，扣五年止。續崇禎八年又奉文：為遵旨會商理餉等事，全扣生員優免助遼銀二百六十六兩五錢五分。崇禎十年奉文：為遵旨從長確畫事，十年分生員優免，再扣一年。」該志則係崇禎十年刻本。又據王元士纂修，郝良桐續修，康熙《定海縣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10：443-444，〈物土志・則壤〉：「崇禎年間，奉裁充餉，詎有乘機解作本道書門衣服等用。於崇禎拾伍年間，禮科右給事李如璧題，為取士之典宜恤、養士之典宜優、敬瀝愚言等事，照舊復免。」可知其後仍是反反覆覆。

況下，分拆開來的各戶如何能夠持續維繫在同一軍籍之下，分擔同一名軍役？特別是極度單弱的第三支，甚至沒有一個專屬自己的坊長戶，本可利用軍戶分戶之機，逃離軍籍的羈絆，卻不此之圖，繼續承擔六分之一的湯沐支費，歸根究底，就是政府對於軍籍管理另有一套完整的體系。我們不妨回頭再看桂萼當年的主張以及戶部的批示，章潢，《圖書編》卷九〇，〈授時任民·軍匠開戶〉如是云：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奏為授時任民事。臣考近來有上匠不許開戶之例，蓋為軍匠逃亡事故而設。邇來軍戶有原不同戶，而求告合戶者；又有串令近軍同姓之人，投告而合戶者。匠籍亦然。於是軍匠有人及數千丁、地及數千頃，輒假例不分戶為辭，於是里長甲首人丁事產，不及軍匠人戶百分之一。其法止當不分軍民匠竈等籍，限田限丁，將州縣人戶事產，通融總算，一體分戶。等因，該本部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軍戶子孫畏懼軍役，另開戶籍；或於別府州縣入贅、寄籍等項，及至原衛發冊清勾，買囑原籍官吏里書人等，捏作丁盡戶絕回申者，俱問罪。正犯發烟瘴地面；里書人等捏作丁盡戶絕，發附近衛所，俱充軍；官吏參究治罪。今本官奏要將州縣人戶，通融總算，一體分戶，蓋欲同籍則承軍伍之役，分戶則應里甲之差。今如湖廣之垛籍、山東之分開審差是矣。合行各該撫按官查照施行。

可以說，嘉靖以後里甲制度的變質，讓地方與中央官員開始有了新思維，面對軍戶利用不許分戶的規制，所引發的各種藉由「合戶」以躲避差役的弊端，開始考慮在「同籍則承軍伍之役，分戶則應里甲之差」的大原則下，將「籍」與「戶」區分開來，只要能確保「同籍」戶役的應充，「分戶」毋寧是分擔里甲差役的重要手段。

戶部以湖廣、山東為例，認為其法可行。山東的狀況筆者尚不清楚，但據萬曆《大明會典》卷二〇，〈戶部·戶口二·賦役·凡優免差役〉：

（洪武）七年，令山東正軍全免差役，貼軍免百畝以下。餘田與民同役。

可知山東有大量的垛籍軍，其成立時間較湖廣更早。¹¹⁸ 所謂「分開審差」，或指編審差役時乃是將正軍戶與貼軍戶各自視為獨立的一戶，只有在清勾軍役時才會追究同垛為一軍籍的正、貼戶關係。至於湖廣垛籍，嘉靖二十一年刊《羅田縣志》卷六，〈修武志·軍政〉有云：¹¹⁹

¹¹⁸ 參見于志嘉，〈再論垛集與抽籍〉，《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頁233-235。

¹¹⁹ 祝珣修，楊鸞、蔡元偉纂，嘉靖《羅田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6：79b-80b。

羅田雖無衛所，亦有軍役。但其所以為軍者，洪武初見烟起戶垛之，而一時老故之家少，流集之徒多，故厥後之聚散無常，而軍籍之名存實喪矣。將來清勾之擾，不知將何所底止也。因憑垛軍冊以訂于後。

洪武二十二年垛軍四千。有冊可考，今不悉載。

清軍之弊：羅前此清軍之官，多付之吏書里老，其奸猾者，死生挨解係于財帛，縱有震世之威，不能塞其無情之口。而吏書之弊，則有不可勝言者。如軍戶孫丙原在趙甲之下，而李丁則在錢乙之下，此定籍也。一有清查新造軍冊，則移孫丙于錢乙之下，捏作見解，或挨無，或跟捉，而鄉實無人；錢乙不過廣用貨賄，又得免矣。若復有清查，則仍如前弊，改造舊冊以為應證，里老吏書所得，不知其幾。……有以三戶垛籍而副不認正者，有正缺而副不承認者，非止一端。近年固得清查痛革之法，而官之去留不一，為今之計，不若遵照垛籍，乘其大造，訂于書冊，散給各戶，斯可革其弊之萬一矣。

在以垛籍軍占大宗的湖廣地區，由於一名軍役是由同屬一籍的三戶軍戶共同承擔，為使正軍、貼戶之間順利輪代，¹²⁰ 政府必須清楚掌握各戶間的正、貼關係。¹²¹ 這在洪武二十二年垛籍當時編定的「垛軍冊」中，都有明確記錄，但在其後每十年一次大造軍黃冊時，卻因清軍官常任由里老吏書收賄竄改，軍籍名存實亡。嘉靖二十一年時值大造，為免日後清勾無人，於是回歸洪武二十二年垛軍

¹²⁰ 據《明史·兵志四·清理軍伍》92：2255-2256：「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為軍，衛所無缺伍，且有羨丁。……成祖即位，遣給事等官分閱天下軍，重定垛集軍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軍一，別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至是，令正軍、貼戶更代，貼戶單丁者免。當軍家闕其一丁徭。」參見于志嘉，〈論明代垛集軍戶的軍役更代——兼論明代軍戶制度中戶名不動代役的現象〉，《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¹²¹ 據林富修，黃佐纂，嘉靖《廣西通志》（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31：3b-4a，〈兵防志·寄操〉：「洪武二十年，全州三戶垛充貴州興隆衛軍，天順元年，改解桂林中右二衛收操。成化十三年，勾正軍戶丁起解原衛，以鎮守廣西。太監黃沁為存留軍伍守護地方事，復收桂林中右衛操備。原額軍士八百七十八名，後多逃絕。」其下開二衛現在、戶絕軍數，其中「桂林中衛：三戶見在一十七名。正左軍見在、右軍戶絕四十五名。正右見在、左軍戶絕三十四名。左右軍見在、正軍戶絕五十三名。右軍見在、正左軍戶絕五十三名。改調別衛六名。紀錄二名。逃移二十六名。三戶俱絕八十名」。可知三戶自始即嚴格區分為正、左、右三戶，到嘉靖間仍能正確掌握各自存、絕的狀況。全州，元全州路，屬湖廣道。洪武元年為府。九年四月降為州，省州治清湘縣入焉，屬湖廣永州府。二十七年八月來屬廣西桂林府。參見《明史》45：1149，〈地理六〉。

冊，按老冊所載，將同屬一籍的正貼三戶明白標示於新軍冊中；同時載入勘合戶由，發給各戶各自保管。如此便可免去「副不認正」、「正缺而副不承認」之亂象，同籍軍戶隨時都在政府掌握之中。

就桂萼看來，如果以彼此無血緣關係的三戶垛為一單位的垛籍軍都可掌控其軍籍，一般軍戶的軍役繼承更沒有管控不住的道理。湖廣的「垛軍冊」是垛籍法下的特殊產物，一般軍戶則自洪武二十一年始，就由衛所、州縣、兵部三管齊下，建立了一個管理網絡。這一年，令衛所以亡故軍士姓名鄉貫造清勾冊，送兵部以便按籍勾補；令天下郡縣類造軍戶戶口冊，俾有司能按籍取丁補伍；兵部又另置軍籍勘合，交由內外衛所軍士收存。勘合戶由中開寫從軍來歷、調補衛所年月、及在營丁口之數，遇點閱時，以此為驗；勘合底簿則藏于內府。¹²² 其後逐步完善，原本只針對亡故軍士編立的清勾冊，隨著正統以後鼓勵衛軍在衛生根政策的成功，擴充為以全衛軍丁為對象的旗軍文冊；由郡縣類造的軍戶戶口冊，也從最初只有一種軍黃冊，增加了兜底、類姓、類衛等冊。¹²³ 嘉靖《浦江志略》卷三，〈官守志·冊籍〉記有嘉靖初年浦江縣庫中收貯的各項冊籍，與軍戶有關的就有：¹²⁴

¹²² 詳見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 54-72，〈軍黃冊和民黃冊的關係〉。但韋氏以為，洪武二十一年「設置了“軍戶圖籍”，將全國各地軍戶的姓名、年歲、籍貫、人丁等都進行登記，以作為徵發軍丁入伍及追捕逃軍的根據。這就是軍黃冊的前身，當時也叫做軍戶戶口冊」，與筆者所見不同。根據韋氏在註文中引用的清乾隆官修，《續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13：2892，〈戶口考〉：「詔自今衛所以亡故軍士姓名、鄉貫編成圖籍送兵部，然後照籍移文取之，毋擅遺。違者坐罪。尋又詔天下郡縣，以軍戶類造為冊，具載其丁口之數，如遇取丁補伍，有司按籍遣之」；可知「作為徵發軍丁入伍及追捕逃軍的根據」的，包括由衛所編造的亡故軍士圖籍與司府州縣編造的軍戶戶口冊，韋氏之說有將二者混而為一之嫌。又，彭勇，《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操班軍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頁 220，認為洪武二十一年「各衛所編制逃軍所依是自己所掌握的衛所軍戶冊籍」，所以「自洪武年間以後，各衛所均擁有所轄旗軍的冊籍是毫無疑問的」，其實並無史料根據。

¹²³ 其間變化參見于志嘉，《衛所、軍戶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240-243。有關兜底、類姓、類衛三冊，一直以來都被認為始創於嘉靖三十一年（參見吳晗，〈明代的軍兵〉，《讀史劄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頁 120），今據嘉靖《浦江志略》改（詳下文）。又據陽思謙修，徐敏學、吳維新纂，萬曆《泉州府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6：38a, 57a，〈版籍志·賦役〉，萬曆年間泉州府下各縣編造的軍冊，主要是總會軍冊與兜底軍冊兩種。程楷修，楊偶卿纂，天啟《平湖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8：5a-6b，〈食貨志·戶口〉，則為兜底冊與繼丁冊。似乎各地區狀況並不一致。

¹²⁴ 參見毛鳳韶纂修，王庭蘭校正，嘉靖《浦江志略》（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3：24b-27a。

弘治五年重造建言類衛文冊：知縣王珍造，共四冊。內開：一、有司充發解補來歷，一、有司在籍丁口數目，一、衛所充發繼補來歷，一、衛所在營丁口數目。

（弘治五年）重造軍民類姓文冊：知縣王珍造，共一百零二冊。自洪武十四年起，凡軍匠民戶等籍，如共都共圖共姓者，不拘多少，造為一處，分別籍名。

嘉靖四年重造格眼兜底文冊：凡一冊，知縣毛鳳韶造。內開自洪武十四年起，但一應軍戶見在者，填註流派衛所，并原籍子孫，亦有開除、舊管、新收、實在。戶絕者某年月日身故，奉例某年除豁。

（嘉靖四年）造清理軍伍文冊：凡一冊，知縣毛鳳韶造。內開本縣共充軍士一千六百六名，洪武、永樂等年見在應當一百六十名、丁盡戶存一百名、丁盡戶絕一千三百一十九名。宣德四年以後充發軍人二十七名，見在應當二十名、宥免七名。

如果能確保各種冊籍如實編造，「軍籍」人戶俱在掌控之中，桂萼的理想便也不難實現。從稍後的軍政條例看來，政府也確實朝這個方向努力。譚綸等輯，《軍政條例》卷三，〈軍民黃冊參互稽考〉云：¹²⁵

隆慶六年七月內，該巡按御史蘇民望條陳，本部侍郎石等覆議題准，通行各該清軍御史，嚴督所屬清軍官，將見年均徭冊內人丁，盡數登入民黃冊內；審係軍戶者，摘入軍黃冊。仍將祖軍名籍、充調衛分、接補來歷，填造民黃及均徭冊內，貫串歸一，不許隱漏壯丁。其兜底三冊一體查同登造，毋致有此失彼，甲詳乙略。違者究治。

蘇民望於隆慶五年十月奉命往南直隸、江北、山東清軍，¹²⁶ 翌年七月，上軍黃十議。《明神宗實錄》卷三，隆慶六年七月庚戌：

兵部覆巡按御史蘇民望題軍黃十議。一議戶籍、一議互編、一議開收、一議總撤、一議責成、一議查駁、一議工費、一議追償、一議修架、一議稽查，其說最詳。清查徹底，既可得軍以充今日之營伍；而收藏得法，又可存籍以裨後日之清勾。俱如議。通行直隸各省巡按清軍御史，下所屬一體遵行。

¹²⁵ 參見譚綸等輯，《軍政條例》（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年刊本攝製，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捲）3：34a-b。

¹²⁶ 參見《明穆宗實錄》62：2b，隆慶五年十月庚子。

上舉軍政條例〈軍民黃冊參互稽考〉，即是就「互編」議提出的規範。這個時期，「實徵文冊已普遍被採取來作為管理戶口和徵調賦役工具」，¹²⁷ 清軍御史面對黃冊制度趨於解體，實徵冊取代黃冊的時代趨勢，也即時提出相應的對策。「見年均徭冊」即實徵冊，軍政條例規定實徵冊中有關人丁的記事俱要編入民黃冊；若為軍戶，更需編入軍黃冊。軍黃冊中有關「祖軍名籍、充調衛分、接補來歷」等紀錄，亦須纂入均徭冊與民黃冊中，連同兜底、類姓、類衛三冊，一體查同登造，彼此相互勾核查對，為的就是透過實徵冊來掌控軍戶壯丁，從而確保軍戶戶役的繼承。

隆慶六年正是一條鞭法陸續在各地被推展開來的時期。從軍政條例可以看到，這個時期的清軍御史因應局勢為了掌握軍籍做出許多努力。¹²⁸ 此後，實徵冊上軍戶分戶問題不再困擾清軍官員，實徵冊成為軍籍管理的輔助工具。

五・餘論：里甲黃冊制度與分戶

劉宗周在《水澄劉氏家譜》中，以「山陰縣筆飛坊寄軍籍」來表述自己的戶籍。由於他從小寄籍會稽，對會稽情感特別深厚，推測「寄軍籍」應是「寄籍」與「軍籍」的省稱。水澄在山陰西北隅筆飛坊，劉氏定居水澄自劉文質始。文質有二子，次子瑞吉有二子：子方、子名。子方於洪武中坐市民充吏法入戍邊，得貴州之烏撒衛，劉氏軍籍自此始。

子方有三子，謙、謹、訓。子方充戍時，長子謙甫踰冠，即率弟謹往來貴州供父衣履。謙有三子，長子坦進承大宗，仲子壻奉父命隨叔謹往貴州，不幸死於途；

¹²⁷ 韋慶遠，前引書，頁 229，即指出：「早在隆慶六年，工科給事中鄭岳就建議明王朝中央把各地的實徵文冊加以管理，飭令各州縣把本地區的實徵文冊另造一分，與黃冊一起解到後湖去，以便朝廷掌握這批比較能反映真實情況的第一手資料。同年，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堂還建議應飭令各地官府俱照實徵文冊的內容攢造黃冊，以清隱脫。」與清軍御史所見相同。

¹²⁸ 參見譚綸等輯，《軍政條例》2：23a-b，〈釐正戶籍禁革脫卸〉；2：23b-24a，〈實在另開見役聽繼〉；2：24b-25a，〈開除佃戶女戶等軍〉；3：33b-34a，〈清發遠軍類造文冊〉；3：34b-35b，〈四冊俱要總撤相投〉；3：35b，〈駁回軍冊各該自造〉；3：36a-b，〈攢造軍冊工費申查〉；3：36b-37a，〈建庫設吏收貯軍冊〉；3：37a-b，〈收貯冊籍以備查考〉；3：37b-38a，〈覈實造單改調除豁〉；5：33a-b，〈清出軍人另審軍繼〉；5：33b-34a，〈清出軍人給付軍由〉；7：21a-b，〈審編丁差毋得偏累〉；7：21b-22a，〈開豁盡絕釐正脫漏〉。這時期針對軍籍管理密集頒布了多項條例，以上僅列舉隆慶六年例。

子方則因謙代役得歸老於山陰。劉謙代役後死於戍所，所司行原籍督取嗣丁，謙子孫鬻家資以往，在貴州購募一同姓人劉冕代籍聽點，除認之為壻子鉞的繼子，並為之置田贍給。此後軍役遂由劉冕子孫代代應承，山陰子孫從此免除了親身赴役之苦。

崇禎六年劉宗周撰譜，以「貴州軍宗」稱劉冕之後，藉以明彼此之間並無血緣關係。又，子方在貴州另有一子名保，或為在衛另娶妻所生子，或為養子，實際狀況不明。本隸軍籍，以功陞總旗。其子剛遷閭中，遂為閭中人，又以功陞試百戶。天啟元年，其後人國英由鄉進士任京縣知縣，曾與宗周相往來。國英後以考察去官，兩支遂又失去聯繫。

子方歸老時，劉氏以家難相仍，幾不能立門戶。逮三子劉訓振其中衰，首立公田若干畝為軍宗湯沐費，又酌為迎送往來之禮。他所立下的規範其後為子孫所遵循，崇禎六年劉宗周撰寫〈軍宗卹典〉，對「往日本宗合同文書」中所定、每十年一次軍宗回籍時，原籍宗人應提供的膳食費用、以及臨行時應贈與的軍田租銀，都有清楚交代。從「復舊田如額，又加置伴送田二畝零」來看，二者間的軍裝幫貼關係，持續到明末都不曾改變。

劉訓中興家業頗為有成，不久就恢復到足以應付坊頭里役的程度。到了他的下一輩，甚至出任糧長、解運等重役。但劉氏財富的大量積累，當與劉棟的人仕有關。劉棟於正德六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嘉靖間仕至三品京官，二十七年致仕，同年以疾卒。生前「歲叨優免，恩澤及于全戶。至公沒後，又叨遺澤三年」，劉氏因此積累至富，合族戶田一時高達一萬三千畝。

嘉靖四十五年，山陰縣展開均役改革。在此之前，劉氏因屬軍籍，受惠於軍戶不得分戶，全戶僅需負擔一名坊長役。改革後，坊長役的負擔較前大為輕簡，但劉家所需承擔的役額卻大幅提升。劉煥時已被編為十年里甲，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崇禎十年劉宗周作〈土田志〉時都是如此。明末劉氏尚有田八千餘畝，人丁不下數千丁，但三支發展極不均衡。十名坊長役中，僅一戶為宗子以後分房，其餘全屬第二支劉謹之後。第三支極其單弱，但在軍宗湯沐的分擔上，基本上仍持續劉訓以來三支平分的規範，僅小幅調整由第二支長房代出一半。及崇禎十四年大造，劉宗周以東林黨人力主均田均役，水澄劉氏作為「原籍軍戶」在山陰縣的里甲負擔終於擴增至十四甲，惜寄籍於會稽的部分狀況不明。

本文最後，想要回顧一下過去學界有關里甲、黃冊制度與分戶的討論。

分戶又稱「析戶」。小山正明指出，明代里甲制是以國家對個別戶的支配為基礎，以戶數原則及各里甲間徭役負擔能力的均等化作為里甲編成之主軸。但因各戶間的經濟內容不均等，消長又不一致，為維持各里甲間徭役負擔能力均等化，勢必要由國家進行強力的人為組合。十年一度的黃冊攢造，以及伴隨而來的里甲重組，就具有此種機能。¹²⁹ 特別是在土地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戶的場合，里甲間的均衡遭受破壞，里甲編成遇到困難，這時就有可能針對丁糧眾多的上戶，進行強制析戶。小山氏引正德《大明會典》卷二一，〈戶部六·攢造黃冊〉：

景泰二年奏准，凡各圖人戶，有父母俱亡而兄弟多年各爨者；有父母存而兄弟近年各爨者；有先因子幼而招壻，今子長成而壻歸宗另爨者；有先無子而乞養異姓子承繼，今有親子而乞養子歸宗另爨者；俱准另籍當差。其兄弟各爨者，查照各人戶內，如果別無軍匠等項役占規避窒礙，自願分戶者，聽。如人丁數少，及有軍匠等項役占窒礙，仍照舊不許分居。

認為其中的析戶，不應單純解釋為民戶通過家產分割、自主性的分戶，還應包括政府為維持里甲組織進行的強制析戶。他引章懋，《楓山集》卷一，〈議處鹽法事宜奏狀代某中丞作〉：¹³⁰

謹題為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事。……一曰存恤竈戶，……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為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冊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就將圖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皆免雜泛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

說明藉析戶以補完里甲組織，原本就是攢造黃冊時的定例。

小山正明由明初里甲制度特別強調戶數原則，認為析戶乃是為了滿足戶數原則必要的強制手段。這種看法受到不少日本學者的質疑。特別是在文中引王文祿，《百陵學山·書牘·答范二府書》所云：「或買者別都人，則立為子戶，於賣田人戶圖中，不可那移」，認為明代里甲編成以「都」為地理界線，禁止跨都編里，土地買賣只限同一都內的人可以將田土過割至買田人戶下；若買者為異都

¹²⁹ 例如，小山正明引徐良傳等纂修，嘉靖《撫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7：3a, 12a，〈人道志·戶役籍〉：「國家之制，十戶為甲，甲外一右戶為里長統之。十甲為圖，謂之一里，為戶者百有十，為里長者十。……十歲則更造版籍，均其里甲，以登其戶口、田賦消長之數。……里甲之消長不齊，惟於造版時一均之足矣。」

¹³⁰ 章懋，《楓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46b-47a。以上參見小山正明，《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頁176-187。

人，則需「強制析戶」於該賣田者所屬都里中「立為子戶」，¹³¹ 引發了「析戶」是否等同於「立子戶」的議論。川勝守就認為，「立子戶」與「立本戶」不同。至於明代有關析戶的規定，川勝氏一方面根據《大明律》中有關「別籍異財」的規範，認為明代對分籍分財有嚴格規制，對「分丁析戶以避差徭」早有防範，小山氏所舉諸例證，毋寧是里甲編成原則變質後發展出來的現象。另一方面又指出，明初以來里甲編成中被列入畸零戶的寄莊戶，才是用來維持里甲均衡的重要手段。川勝氏引徐必達《南州草》卷三，〈奏疏·賦役關係匪輕謹申臺臣適均之議乞賜採擇以安民生疏〉：

洪武十四年，編賦役黃冊。其法論戶不論田。於是，戶均田不均，而欺隱之弊萌生。二十年，遣國子生武淳等，定區丈量，為魚鱗圖冊。田各歸都而人從之，田多者跨都立戶，謂之寄莊。於是，都有額里，里有額田，田均而弊以絕。

認為洪武二十年魚鱗圖冊的編定，建立了「田不過都」的原則；而寄莊戶的設置，促使都、里原額達到某種程度的穩定。到了景泰二年，禁止設置寄莊戶，¹³² 取而代之以，才是有條件的允許析戶。但也僅止於揭示了析戶的基準，並無強制之意。¹³³

對於上述這些意見，樂成顯根據現存黃冊檔案及有關文書，做出回應。對所謂「田不過都」，他認為，洪武時期朱元璋在全國推行黃冊制度之初，為了不致因土地買賣而打亂黃冊制度的里甲區劃，實行了「田不過都」之制，這「正是以人戶為中心的黃冊制度實施的前提條件」。但在土地買賣已十分頻繁的明代，這種制度是根本行不通的。他以現存《永樂至宣德徽州府祁門縣李務本戶黃冊抄底》中，永樂二十年黃冊李景祥戶「新收」項下，有數筆購買外都田土的記錄為例，認為黃冊中田不過都之制，終究未能實行多久，很快就改變了做法，後來更

¹³¹ 見王文祿，《書牘》（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2：57a。以上參見小山正明，前引書，頁183。

¹³² 有關景泰二年限制寄莊戶設置的實際意義，詳見于志嘉，〈再論明代的附籍軍戶：以浙江沿海衛所為例〉，《明代研究》30（2018）。

¹³³ 川勝守引李東陽等纂，山根幸夫解題，正德《大明會典》（東京：汲古書院，1989）21：10b-11a，〈戶部·攢造黃冊〉：「（景泰二年奏准）凡各里舊額人戶，除故絕并全戶充軍不及一里者，許歸併一里當差，餘剩人戶，發附近外里輾圖編造，不許寄莊。若有詭立姓名者，許首告改正。其有自願賣與本處人民為業，除豁寄莊戶籍者，聽。若違例寄莊者，所在有司拘問，田地入官。」以上參見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の支配構造：明清賦役制度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頁185-196。

在全國範圍內被完全廢止了。¹³⁴ 至於析戶，雖然他也認為「里甲編制，明王朝是以盡量維持原有人戶的穩定與延續為基本原則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里甲中的人戶難免會有貧難或消亡。這樣，在一定的場合之下，析戶遂成為維持里甲人戶穩定與均衡的一個補充性措施」。但他同時又指出：「一方面在以分散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封建社會裡，析產分戶已成為一種歷史發展趨勢；另一方面又由於官府的賦役政策以及宗族勢力的影響，致使許多大戶析產而未正式分戶，往往形成一個大戶之下包含眾多經濟上獨立的子戶這種狀況。」他並以《嘉靖泉州府永春縣保甲文冊》為例，從其中有不少「戶丁戶」（子戶）的「戶頭」（總戶）屬於民籍，認為「雖然明王朝所定軍、匠不許分戶的政策，對明代析產而未分戶狀況的形成影響很大，但這並不是根本原因。民戶之中析產而未分戶的現象亦相當普遍」。¹³⁵ 不言而喻，他對會典中有關析戶的規定，著重的就不是「強制性」；相反的，藉由析產而不分戶現象的普遍存在，凸顯出民戶分戶有其「自主性」的一面。

上舉各說有關析戶的認知都依據景泰二年例。所不同者，小山氏認為藉析戶以補充消乏里甲之法，早已暗寓於洪武二十四年奏准的攢造黃冊格式中。¹³⁶ 川勝氏則認為，景泰二年以後才開放有條件的析戶，在此之前毋寧是嚴格防範的。對此，鈴木博之引《明太祖實錄》卷二〇三，洪武二十三年八月丙寅：「戶部奏重造黃冊，以冊式一本并合行事宜條例頒行所司。……其上中下三等人戶，亦依原定編類，不許更改，因而分丁析戶以避差徭」，認為洪武二十四年的攢造黃冊

¹³⁴ 參見樂成顯，前引書，頁 355-361。永樂二十年黃冊李務本戶田土資料，見同書，頁 123-124。樂氏又以萬曆二十年嚴州府遂安縣十都上一圖五甲黃冊殘件中所載，該甲排年里長余栓戶為例，指出其所有田土分布在本都者僅 20%，其餘 80% 俱在他都圖，見同書，頁 366。岩井茂樹，〈「嘉靖四十一年浙江嚴州府遂安縣十八都下一圖賦役黃冊殘本」考〉，《中國明清地方檔案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東洋史研究室，2000），頁 47，也以十八都下一圖殘本所記洪彥亮戶下田土，有買自或賣出至他都人戶者為例，認為所謂「田不過都」，不過是具文。

¹³⁵ 以上參見樂成顯，前引書，頁 192, 294。

¹³⁶ 他引正德《大明會典》21：6a-b，〈戶部六·攢造黃冊〉：「（洪武）二十四年，奏准攢造黃冊格式。……所據排年里長，仍照黃冊內原定人戶應當。設有消乏，許於一百戶內，選丁糧近上者補充。圖內有事故戶絕者，於畸零戶內補轄。如無畸零，方許於鄰圖人戶內撥補。」認為：「里長が消乏した場合には甲首戸の上のものより充当し、甲首戸の場合には畸零戸内より、また畸零戸のないときには鄰圖より補充せよとされているが、実は消乏里甲の補充には析戸を以て充てることが行われたのである。」參見小山正明，前引書，頁 181-182。

格式，對於以逃避差役為目的的「分丁析戶」其實是禁止的。景泰二年首度對析戶提出規範，但除了對「先因子幼而招壻，今子長成而壻歸宗另爨者」以及「先無子而乞養異姓子承繼，今有親子而乞養子歸宗另爨者」，無條件允許分戶外；對於「父母俱亡而兄弟多年各爨者」與「父母存而兄弟近年各爨者」，則僅限分戶後不致影響役務負擔者，有條件的允許分戶。對於筆者關心的軍、匠戶不得分戶問題，他則認為，軍戶、匠戶分戶若不致因而引發「役占窒礙」的狀況，是允許其分戶的；但若戶內人丁數少，有可能因分戶導致徭役負擔能力降低，依慣例不許分戶。¹³⁷

鈴木氏的解讀，源自於他將「人丁數少、及有軍匠等項役占窒礙」，斷句為「人丁數少及有軍匠等項，役占窒礙」，忽略了軍匠役本身就具有「役占窒礙」的特殊性。但因他的重點並不在軍匠分戶，且與學界普遍認知不同，本文不擬深論。至於析戶本身，鈴木氏更有說。他引《明世宗實錄》卷四八九，嘉靖三十九年十月戊戌：

一、人戶有父母俱亡而兄弟異居者；有因子幼贅壻，後子長而壻分居者；有因無子以義男為子，後有子而嗣子出居者；必民戶人丁數多，許令分析，及出姓歸宗，或另立戶籍，俱編入正圖。

認為原本無條件允許贅壻或養子歸宗者分戶的規定，到了嘉靖三十九年，也開始要求以「人丁數多」為條件，有關分戶的規制更形強化。這時期正是徽州土地過割文書中大量出現「戶丁」一詞、也是徽州宗族為族產設置「總戶」的高峰期，顯現宗族面對新立戶名不易，為應付共同役務，在黃冊編成上採取的對應方策。

相對於鈴木氏單純從有關析戶的規定來觀察徽州地區析戶的演變，小山氏對析戶的理解則是放在明代賦役改革的脈絡中。他認為，到了明代後半期，隨著鄉紳的社會地位逐漸確立，不少鄉紳透過分籍立戶（析戶）的手段，擴大優免的適用範圍；田多富戶也常與胥吏勾結，花分、詭寄之弊層出不窮。鄉紳的濫免與大戶的詭寄，促使國家的徭役徵收面臨重大困難，鄉紳的土地所有與國家藉由里甲制體現的支配原理兩相悖離。十段法的成立就是為了解決此一矛盾，使原本以國家對個別戶的支配為基礎建構的里甲組織不再是徭役科派的基準，而是直接將全

¹³⁷ 參見鈴木博之，〈明代徽州府の戸と里甲制〉，《宋—明宗族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頁 385。其言曰：「軍戶・匠戶等の徭役を負担していて、『分戸』した場合に役務に支障が生じない場合には『分戸』を認めるが、人丁が少なく役務に支障が生じる場合には以前の通り『分戸』を認めないという付帯条件が付いている。」

縣下各里甲之丁、田（或糧）額均等化，直接以各里甲之丁、田作為科徵里甲、均徭銀的對象。鄉紳優免只限本戶，不再擴大適用範圍於子戶，限額以外的田土須一體科派。唯舊有的以戶數原則編成的里甲組織仍在稅糧徵收、治安維持等里甲正役上發揮作用，他因此將十段法的出現視為明代里甲制解體的第一階段。

以全縣丁田作為役銀科派基準的十段法，後來更發展為一條鞭法。所不同者，十段法是將全縣丁田均分作十段，每年取一段承擔徭役；一條鞭法則統之為一段，年年均派。小山氏認為，一條鞭法施行以後，由於里甲編成不再著重戶數原則，強制析戶也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對此，魯西奇亦有相似的意見。魯西奇、徐斌，〈明清時期江漢平原里甲制度的實行及其變革〉，引述民國《漢川南湖林氏宗譜》卷一七，〈雜編下〉所稱：「萬曆四十一年，從化公以朋黨不便，願以祖分丁糧仍留六甲公完，其餘本身丁稅、夏秋兩稅，另撥三甲，新立本姓戶籍應差」，提出如下見解：¹³⁸

林氏由河泊所「業戶」兼具里甲戶身分，到嘉靖三十六年加入六甲輪役，後以河泊所「業戶」帶同六甲人戶割入景府，又於萬曆二十九年前後與六甲一起回復漢陽縣里甲系統，再到萬曆四十一年新立本姓戶籍，雖然有其家族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但顯然也與官府力圖控制更多湖區已墾田地、戶口的努力不無聯繫。……但是，由於推行「一條鞭法」之後，賦役之徵，併為一條，隨田均丁，計畝徵銀，「賦役一出於田」，戶籍在賦役徵納體系中的作用大為降低，故萬曆以後的清田，並不同時伴隨整頓里甲，¹³⁹更不包括檢括戶口，所以如漢川南湖林氏那樣在萬曆後期新立戶籍應差的事例相當鮮少。

漢川南湖林氏兼具河泊所業戶、里甲戶與軍戶的身分，¹⁴⁰ 問題格外複雜，本文

¹³⁸ 參見魯西奇、徐斌，〈明清時期江漢平原里甲制度的實行及其變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4.1 (2013)：178-179。

¹³⁹ 魯西奇認為，「萬曆以後的清田，並不同時伴隨整頓里甲」，語意有些模糊。濱島敦俊在討論明末浙江均田均役法時指出，嘉靖四十年大造黃冊之前，海鹽縣生員賀整就曾上均甲議，受到知府侯東萊的支持；但要到萬曆九年編審時，才經由海鹽知縣蔡逢時之手得以實施，原因之一就是均甲之法「必待丈量清楚，豁盡虛糧，然後均齊畫一之政可行」。天啟《海鹽縣圖經》9：25a-b，〈官師篇〉記蔡逢時：「公乘丈田後行均甲法，先定士紳免額，次歸併貧里、陞富里，槩以畝三百二十受一役」，說的就是「清田」與「整頓里甲」間的關係。參見濱島敦俊，前引書，頁263-273。

¹⁴⁰ 民國《漢川南湖林氏宗譜》17，〈雜編下〉謂「吾祖避家難，承管開業居此，別以在官軍人尹章在衛頂伍」。參見魯西奇、徐斌，前引文，頁172。

于志嘉

姑置不論；然而，他於萬曆後期新立戶籍應差究竟是不是特例，值得深入探究。以下先看兩個隆萬之際分戶的事例，時間都在一條鞭法實施前後。

其一見陳支平，〈明代福建的戶籍失控與民間私例〉，引《南靖縣莊姓源流·龜洋莊家世代居處貫籍異同記》：¹⁴¹

至萬曆元年，本縣知縣曾球審本族丁多族大，遂撥長房良茂派望賓，頂替陳士昭四甲里役（為望賓戶），其第二房良盛派、塘後房、壠頭房仍舊承當本戶五甲里役（為守全戶），蓋自是戶籍已分矣。

福建是最早出現十段法的地方。小山正明指出，成化初年，邵武知府盛顥就曾「通扣一縣丁田數為十甲，以一年丁糧應一年徭役，週十甲而復始，民甚便之」。惟其後時斷時續，至嘉靖十一年，才又經邵武縣知縣曹察上請於府、司、道，於明年編成「均平徭役冊」，以一縣之丁糧均為十班，以十班之丁糧均為一則。與南靖同屬漳州府的龍巖縣，也在嘉靖初期實施了十段法。嘉靖三十七年刊《龍巖縣志》卷上，〈民物志·徭役〉云：

雜役歲編謂之均徭。嘉靖以前，只輪甲編僉，隨其歲直甲分，則盡甲內人戶丁糧，以應一年之差，間有輕重不均之嘆。爾來通將概縣丁糧裁為十段，次第相承，先後適均，謂之均徭，名稱情矣。

另外，延平府沙縣至遲亦在嘉靖二十一年出現以均徭為對象的「十段冊」。至於以里甲公費為對象的十段法，萬曆《泉州府志》卷六，〈賦役〉云：

嘉靖之季年，郵券濫冒，往來如織。……於是，撫按兩院始令各縣，除正、雜之名，止稱綱銀，¹⁴²以丁四糧六審定規則。又謂十甲輪差，遇有本甲丁米少者，則銀少而差輕；或本甲丁米多者，則銀多而差重；未免有不均之嘆。乃又令各縣將實差丁米，分為十段派編，其法頗稱詳明。

¹⁴¹ 參見陳支平，《民間文書與明清賦役史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4），頁25-26。

¹⁴² 「綱銀」的前身是「綱錢」。成、弘年間，福建曾針對現年里甲負擔的公費，「令見役里長隨其丁田，賦錢輸官，以供一年用度者謂之綱」。後因「綱錢」不足以應付支出，一度恢復了舊制。到了正德八年，御史李如圭推行「綱銀法」，「令里甲以丁米出銀若干」；不料所徵綱銀貯於庫不用，里甲仍「日支應如故」，改革歸於失敗。正德十五年，巡按御史沈灼乃「議將通縣費用分正、雜二綱，以丁四糧六法科派」；又創行「八分法」，將現年里甲負擔的上供物料，亦「通計各縣丁米，每民米一石、男子成丁，各徵銀八分，通融該縣應辦物料，送府轉輸」。至此，福建現年里甲負擔的上供、公費，才都改按丁田多寡，定額化、銀納化。參見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之展開》（東京：東京女子大學學會，1966），頁135-143。

可知於嘉靖末年，福建大部分地區合里甲、均徭，俱已改依十段法徵收。¹⁴³

福建施行一條鞭法的時間，一般認為在萬曆五年至七年間，「其法不論四差，通計一縣歲所應起存支用差銀若干兩，俱於丁糧內均派之，徵銀在官」，「總綱（綱銀、里甲公費）、機（機兵）、徭（均徭）、站（驛站），名四差銀」。與華北、華中各地一條鞭改革最初只及於里甲、均徭相較，福建徭役的一條化，顯得更為先進。¹⁴⁴ 而南靖縣莊氏於萬曆元年由知縣強制分出一戶頂替同里之外姓逃亡戶，時間正在十段法實施之後、一條鞭法推行之前。

另一則為小山正明所提供，滕村姜氏的例子。姜寶，《姜鳳阿文集》卷二七，〈與管嶠谷論自運〉有云：¹⁴⁵

寒家舊以軍戶不分，共為糧里者一，後緣族人稍多，歲時輸將不能協心力，每或借寶以為辭。寶竊病之，遂告諸孫崑石父母，自願於徵冊分戶。戶分姜峒、姜昂、姜鍾、姜範、姜鏞，凡當里長者五。寶係鍾下戶丁，後又以鍾下田地稍多於他族人，而輸將之不協心力猶然也，遂又於鍾下分姜鬲賢為戶，又自當里長一。乃親兄弟姜憲醫士，姜棠黃巖尹，姜寅、姜宋皆生員，及寶五人朋合，而鬲則寶家僕名，賢則棠家僕名，為賤兄弟並忝衣冠之末，難於出名故也。寶擬各便輸將，出不得已而然。今於鬲賢下又分鬲為半子戶，自行上納錢糧，而賢則另有承管。猶恐弟姪輩怠惰不前，混而無所別也，故又不得已而分子戶。

這條史料透漏了許多訊息。一、姜家因是軍戶，一直以來只有一個里長戶。二、由於軍戶不能分戶，長期下來，戶內人丁眾多，賦役輸納往往不能齊心協力。三、姜寶任官之後，族人常藉其名義，希求多方優免。姜寶深以為病，於是主動向丹陽縣令孫崑石請纓，於實徵冊上進行分戶。四、新分出來的五個里長戶，戶名分別為姜峒、姜昂、姜鍾、姜範、姜鏞，姜寶則是姜鍾戶下戶丁。五、後因姜鍾戶下田地較其他各戶稍多，於是又從姜鍾戶下分出姜鬲賢一戶，由姜憲、姜棠、姜寶、姜寅、姜宋兄弟五人朋當。六、以姜鬲賢為戶名，乃是因為姜寶兄弟五人非官即士，「並忝衣冠之末」，不宜以實名應役，因此取寶家僕鬲、棠家僕

¹⁴³ 以上參見小山正明，前引書，頁 156-159。又見谷口規矩雄，前引書，頁 326-329。

¹⁴⁴ 參見谷口規矩雄，前引書，頁 341-344。

¹⁴⁵ 參見姜寶，《姜鳳阿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27：17b-19a。轉引自小山正明，前引書，頁 198 註 41。姜寶為軍戶，姜家「舊以軍戶不分」，惜小山氏未就此多加討論。又，小山氏以為姜寶家在姜寶父親的世代已分為五個里長戶，其實是誤讀了史料。詳下文。

賢二人之名合為戶名。七、儘管姜鬲賢戶是親兄弟五人朋合之戶，但因弟侄輩中難免有怠惰不前者，為免受其牽連，姜寶又以家僕姜鬲為名，於姜鬲賢戶下分立出半子戶，自行上納個人名下錢糧。

姜寶家有《丹陽滕村姜氏族譜》傳世。¹⁴⁶ 據此，滕村姜氏以姜正為一世祖。正有二子，長子智以下為東分，次子毅以下為西分。毅有五子，瑛、理、琳、珪、琨。其中，理充富戶，無嗣；瑛有三子，濟、洪、深；琳有二子，源、濬；珪有一子，汰；琨有五子，澐、渚、瀟、濡、潤。新立五戶中，峒為濟之後（毅—瑛—濟—暉—紀—峒），昂為洪之後（毅—瑛—洪—松—昂），鍾為深之後（毅—瑛—深—時—鍾），鏞為濬之後（毅—琳—濬—薰—鏞），範為汰之後（毅—珪—汰—莊—範）。可以看出，這五戶是以西分祖姜毅之孫輩（濟、洪、深等）為房祖之各房派為主體，各自獨立組成的。由姜鍾戶下分出的姜寶等人亦屬深房（毅—瑛—深—昕—金—寶），並不夾雜他房人丁。至於姜琨五子，澐、渚、瀟、濡、潤，由於五子俱多子孫，估計琨之後應自為一戶。也就是說，峒、昂、鍾、範、鏞、鬲賢是在原有基礎上新分出的六戶，加上原有的一戶，西分姜氏至少有了七個里長戶。

姜寶，字廷善（一作惟善），號鳳阿，鎮江府丹陽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編修，以不附嚴嵩，出為四川提學僉事。再遷國子監祭酒，累官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姜案，字廷和，嘉靖歲貢，隆慶六年任黃巖縣令，尋卒。孫崑石，或即孫珮，字伯玉，山東青州左衛人，戊辰進士，隆慶三年知丹陽縣。管應鳳，字嶢谷，又字肇和，餘姚人，萬曆五年進士，七年任丹陽知縣。¹⁴⁷ 姜寶此信，應作於萬曆七年前後，但其自請分戶，當在隆慶年間。時丹陽已行一條鞭法，¹⁴⁸ 姜寶仍

¹⁴⁶ [江蘇丹陽]《丹陽滕村姜氏族譜》，姜定保纂修，四八卷，清宣統元年餘慶堂木活字本；姜可生總纂，四八卷，民國三十八年餘慶堂鉛印本。二者皆上海圖書館藏。

¹⁴⁷ 以上參見《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340（姜寶）。袁應祺修，牟汝忠等纂，萬曆《黃巖縣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4：11b，〈職官志〉；劉誥等修，徐錫麟等纂，光緒《重修丹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18：22b，〈仕進〉（姜案）。高德貴修，高龍光增修，張九徵纂，康熙《鎮江府志》（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收入《愛如生中國方志庫》）34：23a，〈名宦〉（孫珮）。康熙《鎮江府志》25：37b，〈宰貳〉；邵友濂修，孫德祖等纂，光緒《餘姚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23：21a，〈列傳〉；光緒《重修丹陽縣志》13：19b-20a，〈職官〉（管應鳳）。

¹⁴⁸ 據光緒《重修丹陽縣志·藝文》33：49b-50a，姜志禮，〈復某大尹手札〉：「公莊一事，舊無此名，有之自任怨任勞名令李愛泉諱學道父母始。夫愛泉之有公莊也，非愛泉意也，衡煩不及良鄉、涿郡，而獨著於雲陽，實以坊支、班支無出，民不勝苦，而名令愛泉公身

自請分戶，原因就在過去礙於軍戶的身分不得分戶，長期以來累積了大量丁田，戶下卻只有一個里長役。姜寶任官以後，原本就不能協心齊力供辦里役的族人，更是以姜寶為藉口，意求濫免。姜寶不堪其擾，自請分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的分戶，僅止「於徵冊分戶」，黃冊上應是維持了一戶軍戶的形式。

姜寶自請分戶，隨後又於姜鬲賢戶下分立半子戶，這與一條鞭法實施後，稅役徵收改以丁、田為準當不無關係。¹⁴⁹ 姜寶個人分下田產，開列於新分出的半子戶下，稅糧完納與否，一目了然，不致因總戶內其他人丁拒納或滯納遭受牽連。¹⁵⁰ 此外，姜寶任官期間，受優免則例保障，得免除相當程度的雜泛差役甚至里甲正役，或許也是促使他分立半子戶的原因之一。新分出的六戶，在徵冊上各有各的戶名，官府可以更容易地掌握稅糧催徵的對象。而隨著隆慶六年軍政條例的頒行，新造的軍、民黃冊也應將新戶名一體編入，軍戶分戶不再有違法之虞。甚至就某種意義來說，丁眾田多的軍戶順應各地方均田均甲的施行，成為被強制析戶的對象。「戶」與「籍」成為兩個不同的概念，「分戶」不影響「同籍」，桂萼「軍匠開戶」的理想也隨著一條鞭的推行，全面獲得實現。

（本文於民國一〇六年六月十二日收稿；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通過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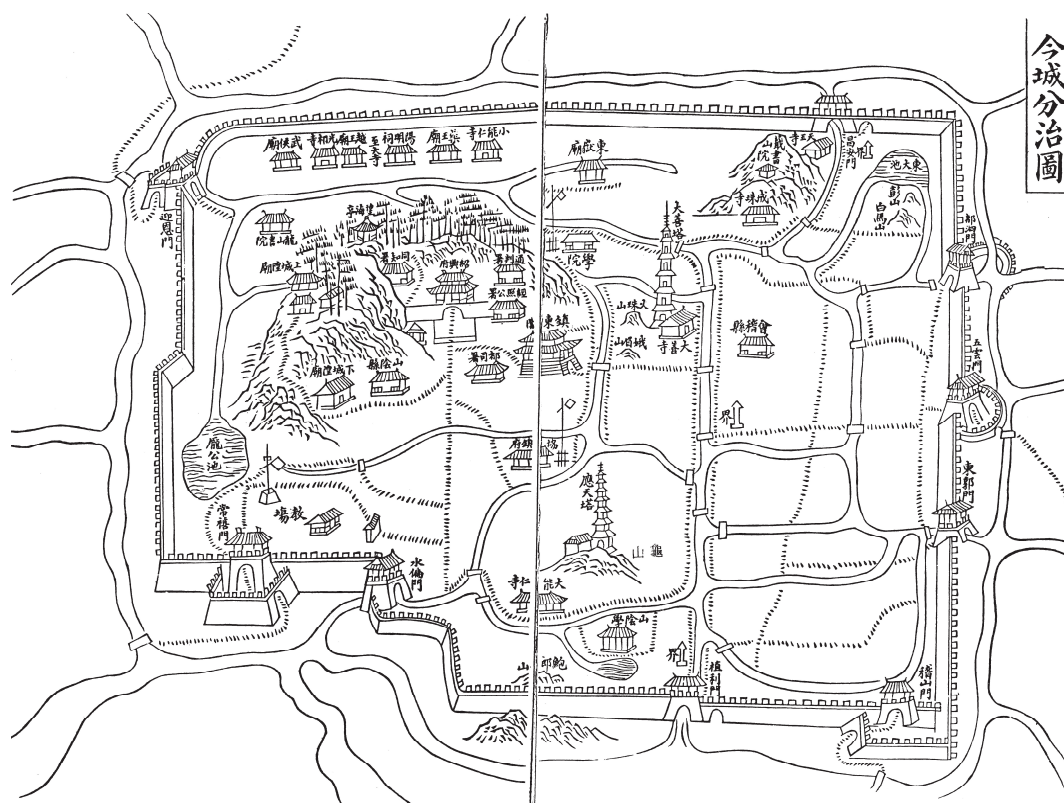
任勞怨，復湖濟運灌田，有大功，上臺以此酬之，而愛泉受之。然受之有名者，亦以坊支、班支受之也。何謂坊支？坊長備酒席折席之儀，送過客，及鄉飲酒禮進表諸費，計費亦不資，至年終具領，庫空不能給與。何謂班支？點定吏農數名，輪辦下程，送過客經年，費亦不資，亦至年終具領，庫空不能給與。後龐撫臺心庵公諱尚鵬，廣東南海人，蒿目江南郡縣支用公費錢糧，瑣碎未易消算，奏請欽依，行一條鞭法。條鞭法行，而坊支、班支革矣。」可知丹陽應於嘉靖四十五年已實行了一條鞭法。

¹⁴⁹ 案：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地區里甲賦役制度與鄉村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191-204，〈論圖甲制中“戶”的性質〉，對明初以來分戶問題以及賦役改革對里甲制中「戶」的變質的影響有所討論；指出一條鞭法改革以後，隨著「戶役」分解為「丁銀」與「地銀」，「直接以丁地為課稅對象，“戶”便不再具有計稅單位的意義和功用。……“戶”變為僅僅是徵稅環節上的一個登記繳納的單位」。從姜寶自請分戶基本上仍以現實中的家庭（或房支）為中心，到崇禎年間水澄劉氏各戶下只登記折抵田額的人丁數，正可反映劉志偉所謂「戶」的內涵隨著賦役制度的改革逐漸過渡的過程。

¹⁵⁰ 劉志偉，〈清代廣東地區圖甲制中的“總戶”與“子戶”〉，《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2）上，頁489，指出「清代廣東圖甲制中，由擁有總戶的家族在同一甲內開立的子戶，往往是為了避免不同利益的房派之間因拖欠稅糧以致互相牽累而分拆出來的」。情況正與此相同。

于志嘉

附圖



紹興府山陰、會稽兩縣分治圖

(嘉慶《山陰縣志·土地志·今城分治圖》5：7b-8a)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崇禎長編》二卷，收入《痛史》第九種 13-14，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
- 《節行事例》，收入《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3，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 《劉子全書及遺編》，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
- 不著撰人，《萬曆邸鈔》四五卷，據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本傳鈔，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藏本。
- 毛鳳韶纂修，王庭蘭校正，嘉靖《浦江志略》八卷，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嘉靖五年刻本影印，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19，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
- 王元士纂修，郝良桐續修，康熙《定海縣志》存十三卷，卷五至一七，據清康熙間抄本影印，收入《浙江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30-31，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 王文祿，《書牘》二卷，據百陵學山本排印，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社會科學類》26，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 王世貞撰，董復表輯，《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據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傳記類》112，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 司能任修，屠本仁纂，嘉慶《嘉興縣志》三六卷首二卷，據清嘉慶六年刻本影印，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史部地理》95-96，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朱奇齡，《續文獻通考補》，據清鈔本影印，收入《九通拾補》4-6，北京：北京圖書館，2004。
- 朱國禎，《朱文肅公集》不分卷，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13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朱國禎，《湧幢小品》三二卷，據明刻本斷句重印，收入《明清筆記叢刊》，上海：中華書局，1959。
-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編，《中國歷代食貨典》，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9。
- 何喬遠，崇禎《閩書》一五四卷，據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204-207，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于志嘉

吳廷燮撰，魏連科點校，《明督撫年表》，收入《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2。

吳甸華修，俞正燮纂，嘉慶《黟縣志》十六卷首一卷，據清道光五年刻本影印，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56，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李周望輯，蔣元益、王際華等續輯，《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

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萬曆《大明會典》二二八卷，據萬曆十五年司禮監刊本影印，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

李東陽等纂，山根幸夫解題，正德《大明會典》一八〇卷首一卷，據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刊本影印，東京：汲古書院，1989。

李銘皖、譚鈞培修，馮桂芬纂，同治《蘇州府志》一五〇卷，據清光緒八年江蘇書局刻本影印，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7-10，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杜思修，馮惟訥纂，嘉靖《青州府志》十八卷，據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影印，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41-42，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5。

林時對，《留補堂文集選》四卷，據民國二十九年四明張氏約園刊本影印，收入《四明叢書》第六集 21，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8。

林富修，黃佐纂，嘉靖《廣西通志》六十卷，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187，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邱濬，《大學衍義補》一六〇卷首一卷，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712-71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邵友濂修，孫德祖等纂，光緒《餘姚縣志》二七卷首一卷，據清光緒二十五年刊本影印，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500，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南大吉纂修，嘉靖《渭南縣志》十八卷，據明嘉靖二十年鈔本影印，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陝西府縣志輯》13，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姚名達，《劉宗周年譜》，收入《中國史學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姚崇儀輯，萬曆《常熟縣私志》二八卷，民國二十三年抄本，收入《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合肥：黃山書社。

姜可生總纂，〔江蘇丹陽〕《丹陽滕村姜氏族譜》四八卷，民國三十八年餘慶堂鉛印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姜定保纂修，〔江蘇丹陽〕《丹陽滕村姜氏族譜》四八卷，清宣統元年餘慶堂木活字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姜寶，《姜鳳阿文集》三八卷，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127-12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 孫懋，《孫毅菴奏議》二卷，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2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徐元梅等修，朱文翰等輯，嘉慶《山陰縣志》三十卷首一卷，據清嘉慶八年修民國二十五年紹興縣修志委員會校刊鉛印本影印，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581，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徐良傳等纂修，嘉靖《撫州府志》十六卷，據明嘉靖三十三年刊本影印，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925，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晏文輝修，唐鶴徵纂，萬曆《武進縣志》八卷，據清抄本影印，收入《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60-63，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
- 祝翊修，楊鸞、蔡元偉纂，嘉靖《羅田縣志》八卷，據明嘉靖刻本影印，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62，上海：上海書店，1990。
- 袁應祺修，牟汝忠等纂，萬曆《黃巖縣志》七卷，據寧波天一閣藏明萬曆九年刻本重印，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18，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
- 高登先修，單國驥纂，康熙《山陰縣志》三八卷，民國鈔本，收入《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合肥：黃山書社。
- 高德貴修，高龍光增修，張九徵纂，康熙《鎮江府志》五四卷，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收入《愛如生中國方志庫》，合肥：黃山書社。
- 張廷玉等奉敕撰，楊家駱主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8。
- 梁兆陽修，蔡國楨纂，崇禎《海澄縣志》二十卷，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影印，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
- 清乾隆官修，《續文獻通考》二五〇卷，據萬有文庫版重印再版，收入《十通》第8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 畢自嚴，《度支奏議》一一九卷，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483-4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盛熙祚纂修，雍正《靈山縣志》十二卷，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清雍正十一年刻本影印，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48，北京：中國書店，1992。
- 章潢，《圖書編》一二七卷，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968-97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章懋，《楓山集》四卷附錄一卷，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影印，收入《四庫明人文集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于志嘉

- 許東望修，張天復、柳文纂，嘉靖《山陰縣志》十二卷，據明嘉靖二十二年修三十年刻本影印，收入《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105-106，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 郭鑒，《皇明太學志》十二卷，據明刊本影印，收入《太學文獻大成》5-7，北京：學苑出版社，1996。
- 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五〇四卷補遺四卷，據明崇禎間雲間平露堂刊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62。
- 陳仁錫，《無夢園初集》三四卷，明崇禎六年刻本，收入《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合肥：黃山書社。
- 陳思修，繆荃孫纂，民國《江陰縣續志》二八卷，據民國十年刻本影印，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26，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 陳善等修，萬曆《杭州府志》一百卷首一卷，據明萬曆七年刊本影印，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524，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陳龍正，《幾亭全書》六四卷，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藏清康熙雲書閣刻本影印，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1-12，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嵇曾筠等修，雍正《浙江通志》二八卷，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176-177，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焦竑編，《國朝獻徵錄》一一九卷，收入《明代傳記叢刊》109-114，臺北：明文書局，1991。
- 程楷修，楊儁卿纂，天啟《平湖縣志》十九卷首一卷，據明天啟刊本影印，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27，上海：上海書店，1990。
- 陽思謙修，徐敏學、吳維新纂，萬曆《泉州府志》二四卷，據明萬曆四十年刊本影印，收入《中國史學叢書》三編四輯 38，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 馮惟敏纂修，王國楨續修，王政熙續纂，萬曆《保定府志》四十卷，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三十六年刻本影印，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
- 馮琦等編，《萬曆辛丑會試錄》，據明萬曆間刊本影印，收入《明代登科錄彙編》21，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
- 馮夢龍纂修，崇禎《壽寧縣志》二卷，據明崇禎十年刻本攝製，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捲。
- 黃宅中修，鄒漢勳纂，道光《大定府志》六十卷，據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影印，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48-49，成都：巴蜀書社，2006。

- 黃彰健校勘，《明實錄》，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楊維新修，張元汴、徐渭纂，萬曆《會稽縣志》十六卷首一卷，據明萬曆刊本影印，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28，上海：上海書店，1990。
- 葛振元修，楊鉅纂，光緒《沔陽州志》十二卷首一卷，據清光緒二十年刻本影印，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4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 葛培嶺注譯，《詩經》，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 董欽德輯，康熙《會稽縣志》二八卷首一卷，據清康熙二十二年修民國二十五年紹興縣志修志委員會校刊鉛印本影印，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553，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劉大觀纂修，〔浙江紹興〕《水澄劉氏家譜》，據清末抄本影印，收入《清代民國名人家譜選刊續編》64-66，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 劉沂春修，徐守綱纂，崇禎《烏程縣誌》十二卷，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刻本影印，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 劉宗周，《劉子全書》，據清道光間刻本影印，收入《中華文史叢書》七輯 57，臺北：華文書局，1968。
- 劉誥等修，徐錫麟等纂，光緒《重修丹陽縣志》十卷首一卷，據清光緒十一年刊本影印，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409，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劉廣生修，唐鶴徵纂，萬曆《重脩常州府志》三二卷，據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影印，收入《南京圖書館孤本善本叢刊·明代孤本方志專輯》，北京：線裝書局，2003。
- 劉應桂等纂修，〔浙江紹興〕《水澄劉氏家譜》十二卷，據民國二十二年紹興大路廣文印書館鉛印本影印，收入《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家譜資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譜叢刊》251-254，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 樊維城、胡震亨等纂修，天啟《海鹽縣圖經》十六卷，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208，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 蕭良幹等修，張元忬等纂，萬曆《紹興府志》五十卷首一卷，據明萬曆十五年刊本影印，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520，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于志嘉

譚綸等輯，《軍政條例》七卷，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年刊本攝製，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捲。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一二〇卷，臺北：廣文書局，1979。

二・近人論著

于志嘉

- 2005 〈論明代的附籍軍戶與軍戶分戶〉，《文集》編委會編，《顧誠先生紀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頁 80-104。
- 2006 〈再論垛集與抽籍〉，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頁 197-237。
- 2009 〈論明代垛集軍戶的軍役更代——兼論明代軍戶制度中戶名不動代役的現象〉，邱澎生、陳熙遠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35-85。
- 2010 《衛所、軍戶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2012 〈明代軍戶中的家人、義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3：507-570。
- 2014 〈異姓別籍或復姓歸宗：以廬江錢氏家族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5.4：769-826。
- 2018 〈再論明代的附籍軍戶：以浙江沿海衛所為例〉，《明代研究》30：1-70。

王毓銓主編，劉重日、張顯清副主編

- 2000 《中國經濟通史・明代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

吳金成

- 2005 〈國法與社會慣行——以明代紳士「優免則例」為中心——〉，高明士編，《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二，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349-375。

吳晗

- 1956 〈明代的軍兵〉，《讀史劄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92-141。

宋昌斌

- 1991 《中國古代戶籍制度史稿》，西安：三秦出版社。

韋慶遠

- 1961 《明代黃冊制度》，北京：中華書局。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

1965-1966 《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張顯清

1992 〈論明代官紳優免冒濫之弊〉，《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4：100-111。

梁方仲

2008 《明代賦役制度》，北京：中華書局。

陳支平

2004 《民間文書與明清賦役史研究》，合肥：黃山書社。

彭勇

2006 《明代班軍制度研究——以京操班軍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湯綱、南炳文

1985 《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劉志偉

1992 〈清代廣東地區圖甲制中的“總戶”與“子戶”〉，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上，北京：中華書局，頁 486-497。

2010 《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地區里甲賦役制度與鄉村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魯西奇、徐斌

2013 〈明清時期江漢平原里甲制度的實行及其變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4.1：149-197。

濱島敦俊著，吳大昕譯

2008 〈明代中後期江南士大夫的鄉居和城居——從「民望」到「鄉紳」〉，《明代研究》11：59-94。

樂成顯

2007 《明代黃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小山正明

1992 《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山根幸夫

1966 《明代徭役制度の展開》，東京：東京女子大學學會。

川勝守

1980 《中國封建國家の支配構造：明清賦役制度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于志嘉

田中正俊

- 1961 〈民變・抗租奴變〉，《世界の歴史 11：ゆらぐ中華帝國》，東京：筑摩書房，1979 新訂版，頁 41-80。

谷口規矩雄

- 1998 《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京都：同朋舍。

和田正廣

- 1978 〈徭役優免條例の展開と明末舉人の法的位置—免役基準額の検討を通じて—〉，《東洋學報》60.1/2：93-131。

岩井茂樹

- 2000 〈「嘉靖四十一年浙江嚴州府遂安縣十八都下一圖賦役黃冊殘本」考〉，夫馬進編，《中國明清地方檔案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東洋史研究室，頁 37-56。

岩見宏

- 1986 《明代徭役制度の研究》，京都：同朋舍。

近藤秀樹

- 1963 〈范氏義莊の變遷〉，《東洋史研究》21.4：461-506。

酒井忠夫

- 1960 《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

曾我部靜雄

- 1953 〈一條鞭法の誕生地〉，《文化》17.6：90-95。

溝口雄三

- 1978 〈いわゆる東林派人士の思想—前近代期における中國思想の展開（上）—〉，《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75：111-341。

鈴木博之

- 1989 〈明代徽州府の族產と戸名〉，《東洋學報》71.1/2：1-29。

- 2005 〈明代徽州府の戸と里甲制〉，井上徹、遠藤隆俊編，《宋—明宗族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頁 383-407。

濱島敦俊

- 1982 《明代江南農村社會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1997 〈農村社會——覺書〉，森正夫等編集，《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頁 155-180。中文本〈農村社會——研究筆記〉，森正夫等編，周紹泉、樂成顯等譯，《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 141-165。

鶴見尚弘

- 1964 〈明代の畸零戸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7.3：35-64。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Service Obligations of Military-Household Families during the Ming: A Case Study of the Shuicheng Lius

Chih-chia Yu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Ming government adopte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of the Yuan dynasty, wherein one's household was registered by the kind of corvée labor and public service that one had to take, and military service was taken by hereditary military households.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military service was always fulfilled, military households were not allowed to be divided during the early Ming. From the Jiajing period, *lijia* and the origin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yellow registers") gradually deteriorated. In order to keep the civil service fulfilled and reasonably allocated to registered households, local officials adjusted the composition of registered households by reorganizing, and sometimes dividing, them.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ingle-Whip policy, the early-Ming principle that civil service was taken in turn among *lijia*, a designated number of registered households in the yellow registers, each year was no longer effective, and the obligations of civil service were allocated by the portion of actual lands and population of each household. Therefore, military households with much lands and many adult males might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units for civil service, and a different register was created to record the actual service alloca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civil service units. Dealing with this situation, Troop-purifying Censors developed their own strategy. In the sixth year of the Longqing reign, the regulations of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required that the records in the registers of current allocation of civil service had to be attached to the entries in military and civil yellow registers. Household units registered in civil and military registers and household units actually taking public service became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two different categories, so that a household being divided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of civil service could be still registered as the same household in official records, and a family registered as military household in yellow registers could have the allocated civil service obligations. *The Genealogy of Shuicheng Lius* was the genealogy of Liu Zongzhou, an important figure of the Donglin

于志嘉

party.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s that were preserved when the genealogy was compiled, in the Chongzhen reig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origin of their militar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 alloca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obligation within the household, and, furthermore, analyses the civil service that this military-household family had to fulfill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formation of tax and corvée system, revealing the efforts the government, under such transformation, made to negotiate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anage non-civil households and their service obligation.

Keywords: militar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vision of military household, *lijia* system, yellow registers, Single-Whip reformation